

從古文詞章學論戴震的《屈原賦注》

陳志信

摘要

眾所周知，戴震（1724-1777）長於考據，其治學每能追溯文字、聲音的演化軌迹，且務與名物制度、經傳注疏相參覈，從而獲得豐碩的成績。然須留意的是，戴震亮眼的考據表現實未能掩蓋其文章成就：像他出色的時文、古文寫作，還有對諸名文做出的豐富評述，無不反映他紮實、深厚的古文詞章學素養。本文試圖就戴震青年時期的著作《屈原賦注》（含《初稿》），來引介、討論戴氏的詞章學。藉由對他治學學歷的考察，還有對唐宋新儒學運動引發的古文詞章學發展史的勾勒，我們發現戴震承接了古文運動以降的學文養氣理念，以及就章法、開闔關鍵、文脈及辭氣諸面向評析作者為文之心的評注技術。故在注解《屈原賦》時，戴震遂透過形色評析，逆體屈原（西元前 340?-278）既未嘗怨對君王、抑不忍輕言絕君的心緒，從而朗現屈子遵奉古來聖賢治道，時時懸念匡輔君主的忠貞志節。總之，運作得宜的品評搭配精煉的考核學力，終讓他自信完成了尤能凸顯屈子之學、志以及立言指要無不至純的《楚辭》論述。最後，綜覽戴震畢生學問，我們發現考據、詞章是二種學力的分陳與相輔濟，乃他治學的根本策略。從學術史角度觀察，戴氏治學確實繼承了古文運動誦文養心、吐辭垂訓的學風，惟他主張須仰仗考核研經之功來保障知見的正確性，以匡正古文詞章學屢屢陷入的自由心證、自圓其說的弊病。故從《屈原賦注》該書，尚能讓我們洞悉戴震學術的這個時代意義。

關鍵詞：戴震、《屈原賦注》、《楚辭》學、古文詞章學、明清學術史

2018/1/13 收稿，2018/2/25 審查通過，2018/5/7 修訂稿收件。

* 本文得到兩位匿名評審的評點與指教，在此深表感謝。

** 陳志信現職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DOI:10.30407/BDCL.201812_(30).0005

On Dai Zhen's *Commentary of Qu Yuan's Fu Poem* from the Aspect of Ancient Prose Writing Techniques Studies

Chen Chih-hsin

Abstract

Dai Zhen (1724-1777) masters verification and presents fruitful study results via meticulous research on thing-naming systems and annotations of classics and related explanatory works so as to trace the evolution of words and pronunciations. 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Dai's brilliance in verification does not overshadow his achievement on writing. For example, his solid and deep literacy in the studies of ancient prose writing techniques is reflected on his outstanding essays, ancient style proses as well as his commentaries on various famous articles. In this paper, I attempt to introduce and discuss Dai Zhen's *Commentary of Qu Yuan's Fu Poems* written in his youth, including *The First Draft*. I investigate Dai's experiences of academic studies and delineate the history of ancient prose writing techniques development triggered by the Neo-Confucianist Movement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Dai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a concept existent ever since the Neo-Confucianist Movement, which celebrates the idea that studying ancient sages' lessons and articles can help one cultivate one's magnanimity. He also continues the techniques of commenting and analyzing the author's writing intentions from aspects such as organization, the key to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context, and momentum of sentences. This is why Dai, when annotating and analyzing Qu Yuan'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340?-278 B.C.) fu poems, is able to understand why Qu never resented his monarch or easily gave up on him. Thus Dai further celebrates Qu's noble loyalty and aspiration to assist the sovereign, which are the ways of the sages. In short, Dai's well written reviews and fine verification skills finally enable him to finish confidently his discourse on the *Verses of Chu*, which especially highlights the pureness of Qu Yuan's works, as well as showcases Dai's aspiration and essential thoughts. Lastly,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Dai's learning of his whole life, I find that verification and writing techniques, two kinds of scholastic abilities mutually complement to each other, are in effect his fundamental studying strategies. From the academic history viewpoint, it demonstrates that Dai's studies indeed succeed the Neo-Confucianist Movement style of reading which aims to cultivate one's mind and writing. Nevertheless, Dai also advocates verification and research as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so as to avoid the major drawback of ancient prose writing techniques studies—arbitrary justification of one's own argument regardless of the evidence. In this way, *Commentary of Qu Yuan's Fu Poems* allows us to have an insight in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cademics in Dai's epoch.

Keywords: Dai Zhen, *Commentary of Qu Yuan's Fu Poems*, *Verses of Chu* studies, ancient prose writing techniques studies,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Ming and the Qing

一、前言

談到戴震（1724-1777）其人其學，世人矚目所在，主要在他考核治經的獨到方法和成就。權借劉師培（1884-1919）〈戴震傳〉的記述，讓我們先行瀏覽他學問的梗概。案劉〈傳〉大抵按照戴君的治學流程，歷敘了諸項學術本事，若：他對六書、古今語、異地方言的討論，對轉語和古韻的考辨，還有為了治經學遂涉獵旁通的典章制度、天文算法和地理學，最後則是晚年戴震屢屢費詞申述的性理學說。引介至此，劉氏遂綜評戴震參驗相干資料以立定說的學術手段：

蓋先生之學，先立科條，以慎思明辨為歸。凡治一學，著一書，必參互考驗，曲證旁通，博徵其材，約守其例。復能好學深思，實事求是，會通古說，不尚墨守。¹

總之，劉氏殆對戴學做出了這般描繪：戴震研討經典，始自考察文字、聲音的淵源演化，且務與名物制度、天文地理等專家之學，還有諸經傳注疏記載相參覈。無怪他每能洞曉經旨、發明義理，提出值得學界參考的學說。

就本文研究對象：《屈原賦注》來說，這本戴震的早期著作，已純熟展現了他考核研經的本領。據考，戴氏而立之年完成該注，且嘗因「家中乏食，與麵鋪相約，日取麵為饗飧」，方得閉戶成書。樂學精神令人感佩。隨後戴震坐館歙縣巨族汪梧鳳（1725-1772）家，於不疏園教書、治學，該書亦賴汪氏助力刊刻問世。²盧文弨（1717-1795）作〈序〉，即以「吾友戴君東原，自其少時通聲音文字之學，以是而求之遺經，遂能探古人之心於千載之上」云云，亦即就戴君的考核治經學力來介紹《屈原賦注》的諸多成果。從盧氏臚列的事例來看，像是：「其釋『三后純粹』，謂指楚之先君」，「『夏康娛以自縱』，謂『康娛』連文，篇中凡三見，不應以為夏太康」，「宓妃之所在，及有娥、有虞，皆因其人思其地，冀往遇今之淑女，用翰寫其

¹ 劉師培：〈戴震傳〉，收於〔清〕戴震撰，楊應芹、諸偉奇主編：《戴震全書》第7冊（合肥：黃山書社，2010年），頁84-88。

² 《屈原賦注》完成在乾隆17年（1752）。同年夏，戴震初次坐館汪梧鳳家。25年（1760）該書初刊，即所謂《歙縣汪氏不疏園刊本》。詳見楊應芹：《段著東原年譜訂補》，收於同上註，頁142-143、151。此外，蓋因汪氏之助，該書音義部分的撰者還假名汪梧鳳（書名《屈騷音義》）。詳見蔣立甫：〈關於《屈原賦注》的三個問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總第47期（1994年1月），頁2。

哀無賢士與己為侶之意」，「《九歌·東皇》等篇，皆就當時祀典賦之，非祠神所歌」，「《九章》無次第，不盡作於頃襄王時」，「〈懷沙〉一篇，則以《史記》之文相參定」，還有「『薛荔拍兮蕙綯』，王逸釋『拍』為『搏壁』，近代多不知此為何物，乃引〈釋名〉『搏壁，以席搏著壁』，增成其義」等等，的確多是參驗考核所得見解。³且戴震〈自序〉亦嘗言：從前「說《楚辭》者，既碎義逃難，未能考識精核，且繭失其所以著書之指」，由是已遂「取屈子書注之，觸事廣類，俾與遺經雅記合致同趣」，以期世間「瞻涉之士，諷誦乎章句，可明其學，睹其心，不受後人皮傳用相眩疑」。⁴對自家注解的緣起和功效，注者本人既如此自道，無怪世人多就考據面評述該書的特色和成績。

然而展讀《屈原賦注》，我們卻發現戴震做了不少評析，用以討論文章的開闔關鍵及段落旨趣：其間關乎承上啟下者，戴注直接標於該章後；於各段截止處，又有精要然周備的段旨評說（及與它段關係的簡述）。體例可謂嚴整、清晰。再對照該書《初稿》，我們還可找到單行夾注，其中多有批評《楚辭》舊注章法謬解處者；另書中羅布著諸多眉批，用以標明、闡發《屈賦》反覆迂曲的辭氣變化。評、批之間，淋漓體現詞章家特有的精神和才情。⁵這不免讓人直欲將該書（含《屈原賦注初稿》）同林雲銘（1628-1697）

³ 〔清〕盧文弨：〈屈原賦注序〉，收於〔清〕戴震撰，楊應芹、諸偉奇主編：《戴震全書》第7冊，頁245。案盧氏所舉七事，惟求女寫哀和考核研經無太大關連。據載，乾隆20年（1755），三十三歲的戴震「始至京師」，「館閣諸公」若王鳴盛（1722-1798）、錢大昕（1728-1804）、朱筠（1729-1781）、紀昀（1724-1805）、盧文弨與王昶（1725-1806）等「皆折節交先生」。詳見〔清〕洪榜：〈戴先生行狀〉，收於〔清〕戴震撰，楊應芹、諸偉奇主編：《戴震全書》第7冊，頁10。這幫學者主因對考據學的興趣方與他定交，故盧氏主就該面向作序。

⁴ 〔清〕戴震：《屈原賦注·自序》，收於〔清〕戴震撰，楊應芹、諸偉奇主編：《戴震全書》第3冊，頁613。案「觸事廣類」乃戴震稱述其參覈互驗的治學方法的術語，也作「觸事廣義」。詳見陳志信：〈論戴震「觸事廣類」的研《詩》方法〉，《中國經學》第16輯（2015年8月），頁119-121。

⁵ 《屈原賦注初稿》乃湖田草堂舊藏，蓋自不疏園流出。詳見許承堯：〈經考附錄跋〉、〈屈原賦注初稿跋〉，收於〔清〕戴震撰，楊應芹、諸偉奇主編：《戴震全書》第7冊，頁243、246。又徐道彬嘗評介《屈原賦注》的文學表現：在文章結構面，「戴注以抒情敘事為線索，對作品的內容虛實、首尾照應、伏筆設置、起承轉合多有指明」；另「從主題意旨、篇章結構、藝術風格諸方面評析屈原作品」的諸眉批，「字裡行間體現出戴震藝術修養之精深和文學觀點之獨到」，且其「注語語暢言宜，異彩橫生」，「著墨新穎，令人領首。讀來使人於思想啟迪的同時，更得以美詞麗句的享受」。詳見徐道彬：〈戴震《屈原賦注》

《楚辭燈》是類書一齊討論。畢竟，縱使戴震不以文章家見譽，《屈原賦注》也不以文章品評見稱，然戴氏該注的確展現了類同林氏的章句辨析學力，亦即「總要理會全局血脉，再尋出眼目來，任他（按：《屈賦》）如何搖曳，如何宕軼，出不得這個圈子，不用一毫牽強，自然雜而不亂，複而不厭」云云。畢竟，像林書透過形色手段，力圖揭曉作家（即屈原，西元前 340?-278）抒情（或述志）成文經過的努力，⁶戴氏注解時可從沒少過，且戴注對屈子動心吐辭的揣度和詮釋，相形下亦並未見絀。⁷

總之，以考據見長的戴震在注騷同時，實有另番學力，亦即所謂的古文詞章學在積極運作著，且其成果和他的考核知見並陳書中。這現象孕育出本文的問題意識，引發我們關注下列課題，像是：戴震的詞章學來歷為何？他對《屈賦》的評析與批注繫屬何種文化活動？該活動的目的、方法及效果為何？還有最重要的，是戴震對《楚辭》的詮釋，在兩種學力的運作下取得何等成就？又該著作對理解戴氏的治學特色，甚至是該時學風有何啟示？凡此種種，且待我們重返歷史，分別就戴震的學歷及相應的文化潮流考察一番，看看有什麼值得爬梳、重述的材料，好引領我們理解斯人斯學的來龍去脈。

二、戴震的古文詞章學學歷

說起戴震的學歷，世人印象自然落在他考據學養的形成過程。據他本人及同時代人的敘述，一切源起於自學：自十七歲始，為求通經明道的戴

的文學成就），《徽學》第3卷（2004年12月），頁286、288-289。該著作的詞章水準可見一斑。

⁶〔清〕林雲銘：〈凡例（之七）〉，收於〔清〕林雲銘撰，彭丹華點校：《楚辭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5。案林氏身為詞章名家，他注騷遂「細心體認本文脈絡」，透過「每篇逐句詮釋，逐段分疏，末以總論櫟括全文」，還有密布文中，那些分別標識「眼目」、「上下呼應處」、「精妙處」、「襯貼處」、「每段小歇處」和「大歇處」的圈點符號，亦即：重圈◎◎，黑圈●●，密圈○○○○，密點、、、，橫截—，曲截⊥，他自信將引導讀者洞曉屈子述志成文的經過。詳見〔清〕林雲銘：〈凡例（之九、之十二）〉，頁5、6。

⁷負責整理《屈原賦注》的蔣立甫，同樣注意到戴震注騷的價值，尤在他「解詞疏義」每「能緊扣原作想像度理」。詳見蔣立甫：〈《屈原賦注》說明〉，收於〔清〕戴震撰，楊應芹、諸偉奇主編：《戴震全書》第3冊，頁608。是評實涉及詞章家擅就文家角度展開批評的本事。

震就對字學、訓詁及諸專家學問投以信賴且積極鑽研之；⁸再來尤重要的，就是鄉先輩，同時是考據學先聲江永（1681-1762）的提攜和肯定，還有徽州諸學友若鄭牧（1714-1792）、汪肇瀧（1722-1780）、程瑤田（1725-1814）、方矩（1729-1789）和金榜（1735-1801）等的切磋與砥礪。這讓他踏實治學且累積著作，為入都後的另番學術因緣做好準備。⁹有意思的是，這始於自學而獲恩師鼓勵、學友贊同的經過，同樣見於戴震的古文詞章學歷，且其間人、事、時、地多有重疊處。

作為同鄉後學，嘗與戴震深入交遊的洪榜（1745-1780），在〈戴先生行狀〉（這是距戴氏去逝最近，且以內容詳實、評述得當著稱的文獻）中記述了數件關於戴氏習時文的信息，其詞章學來歷遂得考見。¹⁰其中最重要的兩則紀錄，一則是：

先生家極貧，無以為業。至是（按：「先生之自邵武歸也，年甫二十」該時）始為科舉文，窮幽極眇，於有明以來，尤愛西安四子、西江五家所傳遺稿。每有所作，意既奧曲，辭復超遠，淺學讀之茫如，或相與非笑之。¹¹

另則為：

先生自江寧歸時，淳安方癸如先生掌教紫陽書院，一見先生文，深折服，謂己所不及。繼而嘆曰：「今之徐子卿也。」同學者請曰：「若某某句，其可通耶？」方先生指而示之曰：「是出某經某

⁸ 分見〔清〕戴震：《東原文集·與是仲明論學書》、《與段茂堂等十一札·第九札》，收於〔清〕戴震撰，楊應芹、諸偉奇主編：《戴震全書》第6冊，頁368-369、531。

⁹ 〔清〕洪榜：〈戴先生行狀〉，頁9。又徐道彬嘗歷數戴震入都前論著，且評述道：「東原22歲著《策算》，23歲著《六書論》，24歲著《考工記圖》，25歲著《轉語》，27歲著《經雅》、《爾雅文字考》，28歲校《太傳禮》、《水經注》，撰《孟子私淑錄》，30歲著《屈原賦注》、《勾股割圓記》，31歲著《詩補傳》，32歲做《水地記初稿》，33歲『挾策入都』，道德文章已達上乘，此時正值朝廷稽古佑文，崇尚經術實學，一時學界高士、『館閣通人』皆『斂衽』問學於戴。紀昀、朱筠等嘆服東原從徽州帶來一種樸實的學術新風，並著意拔擢東原……。」詳見徐道彬：〈徽州樸學成因的地域性解讀——以戴震為中心的考察〉，《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3期（2008年5月），頁106-107。

¹⁰ 〈戴先生行狀〉作於乾隆42年（1777）。該年5月27日戴震甫病逝。洪榜謂他和戴氏「從燕遊久」，故「凡先生之行事緒論，蓋得其大略焉」。詳見〔清〕洪榜：〈戴先生行狀〉，頁14。

¹¹ 同上註，頁8。

史，顧若未讀耳。」因言其命意之精，同學者駭嘆，由是稍稍知先生之能文。¹²

案洪文旨在傳達方氏作為戴氏的文章知音，從中讓我們確認幾件事情：首先，戴震是為了應試這實際目的，才開始鑽研詞章，練習書寫經義的。事實上，明清士子也多因「為科舉文」而踏上古文詞章學的修習道路。其二，引文所謂的「西安四子」、「西江五家」，指的是前明衢州府西安和撫州府臨川二地，分別以方應祥（1561-1628）、艾南英（1583-1646）等為代表的時文流派。二者的共同點是：面對壟罩晚明場屋的浮薄無根文風，他們力圖將經義寫作導回研經而發的正途，並透過結社、刊行範文集等行動發揮影響。¹³有別世人屢就流行套式投機應考的現象，只見戴震「窮幽極眇」，有選擇地就二派「所傳遺稿」，循前賢倡導的窮經吐辭之道來摹寫時文；其文「意既奧曲，辭復超遠，淺學讀之茫如」，竟反遭彼等「相與非笑之」。其三，明清科考既容取巧及第，亦即「近來一種俗學，習為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淺中之徒，轉相放效，更以通經學古為拙」云云，¹⁴識千里馬的伯樂便顯得難能可貴。這正是戴文能獲方燦如（1672-?）賞識的重要。據載，方氏以詞章見聞當世，且他「少嘗受業於毛西河太史之門，稱高第弟子。博聞強記，自經史諸子百家，靡不淹貫，於漢儒箋注，尤能指其舛訛，暢發精確」。作為毛奇齡（1629-1713）高徒，其學術根柢不容小覷。官場失意後他投身教職，嘗「主（按：杭州）敷文（按：書院）講席，口授指畫，有扣即應，如傾河倒峽，無不折服」。要之，「學問淹洽」的方氏既「以古文雄於東南」，¹⁵於雍正到乾

¹² [清]洪榜：〈戴先生行狀〉，頁9。

¹³ 所謂浮薄無根文風，指的是隆慶、萬曆年間，受心學流行及公安派等影響，經義遂悖離儒典，倡言釋、老外道，且多雜俚語諺說。天啟、崇禎年間，遂引發宗經崇雅運動。箇中翹楚，便是成立豫章社來結交同志，編纂《皇明古文定》、《皇明古文待》等範文集的艾南英。詳見高壽仙：〈明清制義風格的嬗變〉，收於朱誠如等主編：《明清論叢》第2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頁432-435。另文獻稱述方應祥「為（按：時）文自闢阡陌，非《六經》語不道，疑義解駁，粹然一軌於正而淵然有光，望而知其為端人正士也」。詳見[清]楊廷望纂修：《浙江省衢州府志》，收於成文出版社輯：《中國方志叢書》第195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頁2082。無怪他能獲得艾氏肯認。案艾嘗推崇方文足為表率，且稱許方氏廣接後進的行動。詳見[明]艾南英：〈青來閣二集序〉，收於[明]艾南英：《天慵子集》（清光緒5年重刊梯雲書屋本），卷2，頁43下-44上。

¹⁴ [明]歸有光：〈山舍示學者〉，收於[明]歸有光：《震川先生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51。

¹⁵ [清]李富孫：《鶴徵後錄》（清同治11年漾葭老屋本），卷3，頁8上。「學問淹洽，以

隆初，他更是和桐城方氏、長洲何氏、宜興儲氏、金壇王氏以及會稽徐氏齊名的舉業宗師。¹⁶學養、詞章均精審的他，遂一眼看出戴文的西安派血統及文中鎔鑄經史的用心處，故能就文向質疑者擘析解釋。¹⁷經名師的品評指點，戴氏的「能文」之名遂傳播開來，行文功力有所增長。¹⁸最後，對照戴震的考據學歷，方棨如前來紫陽書院的時間是乾隆 15 年（1750，戴氏二十八歲），同在該州府級別書院的另個名師就是江永。該時戴震與諸「同志密友，（按：若）郡人鄭牧、汪肇龍、程瑤田、方矩、金榜（按：等）六七君」、「從容質疑問難」的對象，正是江、方二師。且方氏還將戴、鄭、汪並稱作「新安三子」，輯其時文習作為《新安三子課藝》，好讓同學觀摩研習。老師的鼓舞用意可謂無以復加。¹⁹這麼看來，青年時期的戴震確實是雙修考據和詞章學的，且二者都經歷從踏實自學到獲師友讚譽的過程。

那麼，對照戴震考據面的諸多成就，他詞章面的作為有哪些呢？大體看來，他是就持續研習精進且兼及淑人二方向，展開形色行動。除了堅定地遵循鎔鑄經義來闡發道理的正途，習文並赴場屋應試外，²⁰為提升文章水

古文雄於東南」云云，乃杭世駿（1695-1773）的評論。

- ¹⁶〔清〕章學誠：〈葉鶴塗文集敘〉，收於〔清〕章學誠：《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頁207。可補充的是，蓋因方棨如行文強調經史根柢和古風，遂招致批評。若四庫館臣謂方氏「喜雕琢新句，襲積古辭，遂流為別派」，嘉慶年間的劉澹評方文「雖不襲尋常畦徑，究非唐宋諸大家正軌」。分見〔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4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5023；〔清〕李富孫：《鶴徵後錄》，卷3，頁9下。
- ¹⁷前引〈行狀〉謂：方棨如以「今之徐子卿也」評述戴文。案徐日久（1571-?），字子卿，西安人，少以文名。萬曆38年（1610）賜同進士出身。詳見〔清〕楊廷望纂修：《浙江省衢州府志》，頁2083。徐氏嘗與方應祥結社（倚雲社、青霞社）唱和詩文，殆「西安四子」之一。又〈行狀〉謂：戴震嘗承父命就教以時文聞名的戴瀚（1686-1755），他口講經義、即席成文的能力也讓這位族長留下深刻印象。詳見〔清〕洪榜：〈戴先生行狀〉，頁8-9。
- ¹⁸若段玉裁（1735-1815）謂：戴震常秉持方師「善做不如善改，善改不如善刪」該「作文之訣」，其力作《孟子字義疏證》「尤為百鍊之金、精鑿之米」。詳見〔清〕段玉裁：〈答程易田文書〉，收於〔清〕段玉裁：《經韻樓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83。
- ¹⁹分見〔清〕洪榜：〈戴先生行狀〉，頁9；楊應芹：《段著東原年譜訂補》，頁140-141。可補充的是，周永年（1730-1791）嘗揀選能闡發經義、延續注疏傳統的時文，按類輯成《制義類編》，戴震〈吾十有五〉、〈旅酬下為上〉二文即獲選編（楊應芹：《段著東原年譜訂補》，頁140）。後文尚有方棨如評語，他推崇該文足繼武有明時文大家錢福（1461-1504），評述戴震既能融會、梳理經義，寫來亦踏實、周備。詳見〔清〕戴震撰，楊應芹、諸偉奇主編：《戴震全書·補遺》第6冊，頁640，校注3。
- ²⁰正因戴震及諸學友仕途多舛，遂使同鄉「習舉業者，父兄率戒其子弟弗與交，謂所學迂遠無當也」。詳見〔清〕任兆麟：〈戴東原先生墓表〉，收於〔清〕戴震撰，楊應芹、諸偉

準，他也投注許多心血來精煉古文。伴隨著實作練習，他嘗評點、批注（《禮記》）〈檀弓〉及（《史記》）〈項羽本紀〉、〈魏公子列傳〉、〈貨殖列傳〉諸名文，悉心體察並標識諸文家的用心處及效果，若「結構、用意、用筆之妙」等等。²¹再者，他還就儲欣（1631-1706）《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改編成上、下二冊的《唐宋文知言集》。彙整諸大家範文，既方便觀摩、參酌，也樹立起自家標榜的文章品第，即所謂「理與辭俱無憾」者為上，「不惟其理，惟其辭」者次之云云。²²總之，這些品鑑和評說，無不體現戴震的詞章學成績。值得一提的是，親炙江、方二師後，為維持生計，戴震也開始執教鞭：乾隆 17 年夏，他受聘教導汪梧鳳二子，爾後又有多次教書記錄。坐館授業既含詞章一科，故前述評點及文集多可充作教學資源歟。²³那麼，戴震何以做出洋溢詞章學素養的《屈賦》注解（還有汪氏為何贊助《屈原賦注》刊刻），蓋與詞章學的修習、教學脫不了干係。²⁴

奇主編：《戴震全書》第 7 冊，頁 36。至乾隆 27 年（1762），年已四十的戴震方中舉。同考官韓錫胙（1716-1776）評其「文筆古奧」，推斷作者「定為讀書之士」。詳見〔清〕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收於〔清〕戴震撰，楊應芹、諸偉奇主編：《戴震全書》第 7 冊，頁 152。至此，戴震的堅持終有正面回報。

²¹ 據考，戴震的〈檀弓〉批點嘗與徽州學友分享，親家孔繼涵（1739-1783）也嘗用戴批《史記》教授長子廣棡（1755-1799）。詳見〔清〕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頁 186、189。

²² 同上註，頁 181。案儲欣即「宜興儲氏」代表人物。他所以就茅坤（1512-1601）《唐宋八大家文鈔》擴編成《唐宋十大家全集錄》，目的正是為了教導時文。所謂十大家，乃增入李翱（774-836）和孫樵（855 進士，約 867 前後在世）。詳見陳水雲：〈清初宜興派的八股文批評：以豐義儲氏為討論中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59 期（2014 年 7 月），頁 188-189。

²³ 據考，戴震兩次坐館汪家：頭次從乾隆 17-20 年入都前，第二次蓋從 26-27 年（1761-1762）赴江寧應試前。詳見汪世清：〈不疏園與皖派漢學〉，《江淮論壇》總第 162 期（1997 年 10 月），頁 72-75。後戴震結交京師諸公，彼者亦延聘他到家中任教。若乾隆 21 年（1756）館於王安國（1694-1757）家教導王念孫（1744-1832），31 年（1766）館於裘日修（1712-1773）家（《年譜》載），37 年（1772）館於朱珪（1731-1806）家（《年譜訂補》據〈答程易田丈書〉載），37、38 年（1772、1773）他還嘗主講浙東金華書院（《年譜》載）。詳見楊應芹：《段著東原年譜訂補》，頁 148、156、164-165。至於戴震的教學內容，據梧鳳仲子汪灼（1748-1821）回憶，他除講授小學通經之道外，亦申誠為文當取法《史記》、《漢書》，摒棄「近世工剽竊，尚腔調文」。詳見汪灼：〈四先生合傳〉，收於〔清〕戴震撰，楊應芹、諸偉奇主編：《戴震全書》第 7 冊，頁 44。

²⁴ 案方棻如嘗著《離騷經解略》，展現精要的詞章解析功力，附刻其文集《集虛齋學古文》後。詳見〔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4 冊，頁 3823。就詞章教學面看，《屈賦》的確是很好的教材，戴震注騷可能也抱持同樣的目的。

結束本節討論前，我們或可展讀青年戴震的兩篇古文，見識他的行文水準。其一為〈屏山石室記〉：

從吾村南行數百步，有山如屏，曰屏山。山陰取道而上，怪石亘絕，砢然突出。下則石室，傾亞缺圯，似鼻似口，蹲坐其中，肱髀畢露，山故在人境，而幽冷之致，若忘乎人。余因其地辟以為軒，而書其崖石之壁，曰「甗岫」，用誌吾志焉。

噫！以吾村之僻小，而介乎歛西豪華盛麗之區。其曩有友堂先生者，吾族偉人也。相傳晦庵朱子至新安者再，皆過其廬，則吾村之翹于歛西，誠不必以豪華盛麗為也。余既得石室于山之陰，芟其奧草，翦其惡木，植之奇卉美箭，茲地之勝，若自今日始有者，而昔之人長往，足音不聞矣。

山有獸名果然，善緣石壁樹間；有蟲名不過，其狀怒臂奮斧。或曰：不過，茲山所常有也，故即以常名之；果然，非茲山所常有也，故即以非常名之。或曰：否否！果然之皮宜車飾，職在《周官》；斧蟲不過，志乎蜩翼，紀于《爾雅》、《月令》，由來舊矣。之二者，吾未知名實不相謬與否與？²⁵

其二為〈樂山記〉：

杲溪之南多山，其南山之陽，予擇而軒之，以訓馴孫子。築之平之，縮之抹之，移月然後成室。室之前，有殷晦之塘，為原田所利賴。啟之灌之，浸之沃之，然後嘉禾得以成穗。

嗟乎！觀于此，可以知成學之故矣。《書》有之曰：「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暨茨。」又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夫然後可以樂學，未聞無其功而有其獲者，此之謂歟。

山故未有名。或曰，是山也，曾屬目若燈火，屬耳若鐘鼓者幾浹日，鄉之人莫知其故也，遂呼為觀音山。或曰，即杲山也，東接平地，以山嚮日出為杲。予以謂，自世之惑于浮屠氏者，凡有所見聞，不曰山之靈，而曰此浮屠氏之靈也。昔之樂道君子，或在

²⁵ [清]戴震：《戴東原先生文》，收於[清]戴震撰，楊應芹、諸偉奇主編：《戴震全書》第6冊，頁461-462。

南山以南，或在北山以北，今山之可供文人學士游覽者，悉為浮屠氏之居，其必不可與之雜處也。是山幸未入于浮屠，故予得築室于茲，易其名曰樂山，抑亦冀後之人之樂學焉，而於山之靈能見怪物者無媿也。夫苟知樂學，將以尋吾孔、顏之樂不遠矣。²⁶

據考，收錄《戴東原先生文》的這兩篇文章，蓋戴震二十四歲前後，分別代吳希聲、吳入雲（二人蓋徽州鄉紳）所作。²⁷按題覽文，二文乃就希聲、入雲立場發言，先後誌記那位居屏山的石室，還有南山之陽作家族學堂用的軒室。而二文流露一派儒雅風範，蓋代筆者善揣二吳心意所致。引人矚目的是，執筆人戴震還為二文做了諸多批語，若「正文行間題有評語（按：旁批），天頭標有出處文字或說明（按：眉批）」云云。²⁸既更換身分成評點人，戴氏遂充作文評家，細細擘析起作家行文的妥妙處。其間關乎全文章法者，若：〈屏山石室記〉主藉《莊子·徐无鬼》「（按：逃虛空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亦即久隱山林者欣聞人聲該典故，來記敘主人居斯室情貌，既呼應從前朱熹（1130-1200）來新安每過訪先輩友堂（吳杲谿字）先生廬室的美事，亦寄寓斯清幽石室（蓋主人平日修習處）冀盼重聞鴻儒談笑的雅意；〈樂山記〉則援《尚書·梓材》「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暨茨」，以及〈盤庚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是二典，縝密鋪寫「成室」、「成穗」的歷歷過程，既垂示「成學」亦須有功方有獲的道理，還期許子孫或能臻至聖賢的「樂學」境地。²⁹再者，諸批語或點明某些字詞、句子的出處，來朗現作文的汲取、化用過程。像是〈屏山石室記〉首段對奇石岩穴的描寫，以及末段的蟲獸名義，分別擷自《爾雅》、《水經注》、《莊子》、

²⁶ [清]戴震：《戴東原先生文》，頁466。

²⁷ 案《戴東原先生文》乃李氏慶嘉館善本書中的一冊抄本（有些是手稿）。據胡錦賢言，它「尤能幫助我們加深對戴氏文章之學的了解」。詳見胡錦賢：〈說明〉，收於[清]戴震撰，楊應芹、諸偉奇主編：《戴震全書》第6冊，頁445。又〈屏山石室記〉、〈樂山記〉都是「裱貼入冊中的」，〈樂山記〉末天頭有「丁卯附稿」四小字，丁卯即乾隆12年（1747）。詳見同上註，頁486，校注56；頁484-485，校注36。

²⁸ [清]戴震：《戴東原先生文》，頁486，校注56。

²⁹ 《戴震全書》為排版方便，凡眉批、旁批一律改成校注。〈屏山石室記〉、〈樂山記〉關乎章法者遂分見：校注40（「用誌」句：旁批曰「虛提起下」。此句天頭有則出處文字，曰：「《莊子》（按：〈徐无鬼〉）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校注43（「而昔」二句旁批曰：「應朱子、杲谿，筆致超絕。」）、校注57（「此之謂」句：眉批曰：「以成室成穗陪出成學，從成學逆入樂學。」）。詳見同上註，頁485-486。

《列子》、《周禮》及《月令》等古籍。這除能形成古奧的文風，也將造成「如讀《山海經》、《博物志》」般，飽覽異地殊俗名物的享受。此外，像「山故在人境，而幽冷之致，若忘乎人」數語，戴氏亦不吝以「翻成妙語」四字，來稱許該文成功從陶詩名句（即《飲酒·其五》的「心遠地自偏」）化出。³⁰最後，針對《屏山石室記》末段那記述鼪鼯、螳螂異名的行文，以及《樂山記》末段將該山自「觀音山」、「杲山」正式易名為「樂（按：學之）山」的宣言，戴震分別做出下面兩則批語：

體製本鄺道元《水經注》。唐人作記猶近古，趙宋以來此調不彈久矣。篇法以奧峭見古，不令人一望輒盡。

此學記（按：指前代山水記文）體也。處處就目前指點于吾儒異端辨別廩廩。³¹

戴氏意謂：二文乃取法《水經注》及有唐山水記文，援所謂的「學記體」，或者教文章收在重重傳言間，造成「奧峭見古，不令人一望輒盡」的效果（若《屏山石室記》），或者透過「吾儒」、「異端」間「辨別廩廩」的森嚴書法，來申揚吾輩儒者獨具的師聖樂道情操（若《樂山記》）。要之，此皆取法典型的行家手段，惟負詞章素養者方能寫，也惟善品鑑者能指點出。一路覽讀至此，只見戴文寫來得體而出色，評說專業而淋漓，其詞章學養誠不容輕忽。

論述至此，我們可說：自徽州治學伊始，有志聞道的戴震除汲汲從事考核研經工作外，為了因應科考，他也傾注了相當心力在詞章研習活動上。值得注意的是，他非但練就了實作（包括時文和古文）的本事，那時而展

³⁰ 分見〔清〕戴震：《戴東原先生文》，頁485，校注38（「蹲坐」句旁批曰「二句妙」。其天頭有一則出處文字，曰：「直曰亘，橫曰絕，亘絕本《爾雅》……傾亞缺圮本《水經注》（按：應出自柳文《柳州東亭記》，戴氏誤記）。似鼻似口本《莊子》（按：《齊物論》）。」）、校注40（「用誌」句：此句天頭有則出處文字，曰：「《莊子》聞人足音愛然而喜矣。《爾雅》（按：《釋山》）山有穴曰岫。」）、校注44（「山有獸」以下四句旁批曰：「此段亦從《莊子》（按：《徐无鬼》）『藜藿柱乎鼪鼯之徑』句生出，如讀《山海經》、《博物志》。」天頭上有一則釋語曰：「果然，鼪鼯類；不過，螳螂也。《莊子》（按：《人間世》）『螳螂怒臂當車轍』；《列子》『螳螂行則奮斧臂』。」）、校注45（「或曰」句天頭有一則文字曰：「《周禮》（按：《春官宗伯·巾車》）然禛注云：『然，果然也。』《爾雅》（按：《釋蟲》）：『不過，蝗蟻。』《月令》（按：仲夏之月）：『螳螂生。』《莊子》（按：《達生》）：『惟蜩翼之知。』蜩，蟬也。」《莊子》（按：《山木》）又云：『蟬得美蔭，螳螂執臂而搏之。』」），還有校注39（「山故」以下三句旁批曰：「心遠地偏（按：《飲酒·其五》），翻成妙語。」）。

³¹ 分見同上註，頁485，校注46；頁487，校注61。

露的鑑賞、評析能力更是難掩光芒。職是，《屈原賦注》會有如此豐富的詞章品評，遂是可以理解，或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三、古文詞章學的形成與文化

在正式討論戴震注騷的成績和意義前，我們或應先行回顧古文詞章學的發展梗概。此舉既為檢驗前文提及的那些戴氏的詞章面作為，其實無不呼應唐宋元明以來的文化潮流，亦為究明包括《屈原賦注》在內的諸詞章評析，企圖了解它們的共通精神為何，還有其批評模式及準的何在。論述間，我們將會有幾點發現：第一，導因古文運動和理學的介入科舉，先後藉策論和經義考試樹立起鑑文睹心的取士準則，此舉遂使詞章學的萌發成為不可逆的趨勢；第二，為求告捷考場，諸評家及文派先後做出若干貢獻，汲取大家文章精髓以提煉行文水準的看法迅速成為共識，古文詞章學的精神、內涵和方法隨之獲得確定；第三，為評說大家吐辭之妙，諸評家每每藉助批注或評點，好揣度、推衍作者的立意和用心，種種往返文心、篇章字句間的講說，遂積累成豐富又精煉的詞章學論述，而這也是新儒學運動強調的學文養氣、修德垂文諸信念的重要落實管道。下文分別論述之。

（一）鑑文睹心的取士準則，詞章學的發展動力

顧名思義，古文詞章學自然源出古文運動，然實因宋元以降科考倚重策論和經義的措施，方啟動詞章學源源發展的能量。

瀏覽制度史，情況大抵是這樣的：宋嘉祐2年（1057）歐陽修（1007-1072）主持省試揀擇，確定了就流暢古文書寫策論的局面；熙寧4年（1071）王安石（1021-1086）主導學校及考選改革，讓闡釋經典意涵的經義登上了歷史舞臺；加上元延祐（元、2年，1314-1315）開科，明訂了遵奉程朱注疏諸規定。種種變革，終於造就明以後那「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的應試文體的產生，這就是戴震當時須研習的時文。³²從文化史角度觀察，上述制度面的變化，其實是包

³² [清]張廷玉等撰：〈選舉志〉，收於[清]張廷玉等撰：《明史》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693。有關明清時文的淵源，朱瑞熙嘗上溯宋元以來變革，並對照諸實作、程文和指導論著，得出宋代考試文體已形成十個段式（即：破題、接題、小講、繳結、官題、原題、大講、餘意、原經和結尾）的體式，具備了八股文（即：破題、承題、起講、領題、起股、出題、中股、後股、束股和落下）之雛形的結論。詳見朱瑞熙：〈宋元的時文——八股文的雛形〉，收於朱瑞熙：《嚶城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括古文運動、新經學和理學在內的新儒學運動成員介入並主導科考的結果：且看一批批主事者提出振興儒學經術的理念或主張，著手更動科舉規則。為期造成天下崇經重儒的風氣，他們決意透過尤能鑑別才識、德行的策論和經義來取士。³³連番行動便造成詩賦和文章間產生了消長變化：嘗於隋唐科場備受矚目的詩賦，注定將失去長期占有的重要地位。畢竟，新儒學運動諸賢變動科考的目的，就在用考試引導教育。新的政策既期待舉子專研聖賢遺經，好成為經理家國的棟樑，於是應考詩賦所需要的訓練或被期待的表現，若：「巧言麗辭以為工」、「鉤章棘句以為奧」，還有「取青妃白，駢四儷六以為華」、「繁稱遠引，搜奇抉怪以為博」等等，³⁴就會被認定浪費了學子珍貴的學習時光，甚至還會養成士子浮華虛榮的習氣。無論事實如何，詩賦考試被判定成誤人子弟的惡法。³⁵相對而言，朝廷舉士既揚舉觀文以鑑才、識德之大蠹，那麼，無論是否有真才實學，應試者能否就「文」來說動考官，遂成為決定科場勝負的關鍵歟！職是，如何有效提升行文水準，怎麼寫出讓人有感的文章，便將成為天下舉子矚目的新顯學。

2001年），頁1-22。

³³ 蒲彥光嘗援引劉熙載（1813-1881）〈經義概〉闡說經義淵源，遂談到古文運動和理學的道統觀一路貫穿到明清經義的課題。詳見蒲彥光：〈談八股文如何詮釋經典〉，《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6期（2009年3月），頁141-143。

³⁴ 〔清〕張伯行：〈原序〉，收於〔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

³⁵ 熙寧改制時，王安石說服宋神宗（1048-1085）的說詞即：「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中書門下遂議：「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詳見〔元〕脫脫等撰：〈選舉志〉，收於〔元〕脫脫等撰：《宋史》第11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3617-3618。元皇慶2年（1313）中書省奏言亦謂：「經學的是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勾當，詞賦的是吟詩、課賦、作文字的勾當。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人都習學的浮華了……俺如今將律賦省，題詩、小義等都不用，止存留詔誥章表，專立德行明經科。明經內《四書》、《五經》，以程子、朱晦庵註解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學。這般取人呵，國家後頭得人材去也。」次年遂按此議取士。詳見〔元〕完顏納丹等撰：《通制條格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220。至於策論和經義是否真能培養出經世幹才？詩賦是否真的敗壞人才？朱迎平嘗引蘇軾（1036-1101）〈議學校貢舉狀〉，談到此等主張或攻擊都沒有必然性。且就考選實務說，蘇文還指出正因詩賦有「聲病對偶」等標準，取士程序反明確易行。然即便詩賦科嘗復立，宋代的趨勢仍是策論尤盛，經義逐漸勃興，詩賦則走向下坡。詳見朱迎平：〈科舉文體的演變和宋代散文的議論化〉，收於朱迎平：《宋文論稿》（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9-27。

作為戴震的徽州學友，彼此交情甚篤的程瑤田，嘗為文討論經義到底能不能為國舉才。他認為：就經義的異名「經藝」其名義分析，這項考試的目的本為教士子「含咀《六經》之英華，漱其芳潤而出之」，也就是考核其吸收、銷融經義，還有能否精妙闡述之的能力，是以朝廷此舉誠有鼓勵舉子專務聖學的美意，國家也確能藉此覓得良才。然話鋒一轉，程文既而感歎：由於世人徒將考試視作利祿之途，遂產生「執經就傳，皆不首其義，而徒記誦其辭章」，這只背誦可能會考的段落章句而不踏實鑽研義理的錯誤學習，還有摭拾甫記得的些許經文來敷衍作文的取巧念頭，再加上「一二從懶之徒，用益因陋就簡，人有摘抄之書，戶有秘授之冊」，這直就應考祕笈誦習流行套式的卑劣行徑，終於造成士人多掠過讀經本業的現象。故就因考場充斥著「依口拾慧」、名實不符的時文，到頭來竟真坐實經義無能為國舉才的論調！³⁶這樣的結果直教人惋歎，但它不正說明：摘藻、布局等屬文能力確為決勝科場的關鍵嗎！要之，程文敘述的現象縱使不入流，它畢竟反映了生在鑑文取士的時代，士子必須擁有詞章能力的現實。當然，作為一門學問，詞章學的發展不會僅限於提供「摘抄之書」、「秘授之冊」的程度的。

（二）範文的編輯與評析，取法大家文以精煉詞章的共識

承上所論，其實不用等到明清，自科考仰仗文章伊始，擱置典籍，僅就詞章面下功夫的情形就很普遍。歷史研究顯示，宋代已有下列數種時文書刊：第一類是中式文章的刊本，這類刊物蒐集經考場驗證過的文章，好教學子模擬、仿效（甚至直接記誦，好作剪裁、拼湊之用），其市場銷路之廣可以想見；另一種是舉子自行選輯的時文稿集，用途蓋與投費、行卷風氣相干（在彌封制度下，考生企圖讓考官先熟悉自家文風，以利試卷能被認出），其重要性亦無庸多言；最後還有一種，是「中規中矩地教人如何寫考試程文」的書刊。站在關心詞章學發展史的立場，是類論著既本本分分講授作（時）文道理，自當成為我們關注的焦點。³⁷

³⁶ [清]程瑤田：〈胡左元時文序〉，收於[清]程瑤田撰，陳冠明等校點：《程瑤田全集》第3冊（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頁387-389。

³⁷ 劉祥光：〈時文稿：科舉時代的考生必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2期（1996年9月），頁50-52。針對該類書刊嘗發揮的影響，劉氏有豐富、生動的討論。詳見劉祥光：〈宋代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臺大文史哲學報》第75期（2011年11月），頁71-77。

面對南宋到元代紛紛出現的講授類型書籍，按照和考試的緊密程度，約略還可分作兩種：其一是緊貼著應試文章來進行講說者，像魏天應的《論學繩尺》和倪士毅（1303-1348）的《作義要訣》，即分別針對「試論」和「試經義」兩種時文而發，其內容除收集勘作範式的考場實作外，亦輯錄諸多作文要訣講義，提供從主題立意到不同段式的側重寫法等各色意見。³⁸至於另類論著雖亦不離應考目的，其選文卻能從大家文章下手，且在講評上積極利用一套評點系統，好細膩解析範文諸多好處。這就是呂祖謙（1137-1181）的《古文關鍵》，及由此展開的系列著作，若樓昉（1193 進士）的《崇古文訣》（原名《迂齋古文標注》）、謝枋德（1226-1289）的《文章規範》等等。著述旨趣都在提振時文水平的兩類書刊，確實提出許多精闢、實用的行文或觀文法，作文須考慮的諸多課題，像是：主題或主張的確立，論述軸線或架構的設定，乃至造句、遣辭諸事宜，還有對不同類型論題的應有認識，須參考、觀摩的論說體式等等，無不得到一定程度的討論。凡此種種，都教詞章理論得到顯著開發。³⁹不過，我們尤其重視後者，原因首在呂氏等文評家開始向「古文」範疇汲取資源：其眼光從唐宋文開

³⁸ 《論學繩尺》卷首有《論訣》一卷，收羅諸多時文講義，若：〈諸先輩論行文法〉、〈止齋陳傅良云〉、〈福唐李先生《論家指要》〉、〈歐陽起鳴《論評》〉和〈林圖南《論行文法》〉等。《作義要訣》則主要引用曹涇（1234-1315）的講論。詳見朱迎平：〈宋代科舉試論考述〉，收於朱迎平：《宋文論稿》，頁 54-55、60。且朱文發現，二書對文章格式的討論「如出一轍」，故試論體式直接影響且規範了試經義（朱迎平：〈宋代科舉試論考述〉，頁 60）。

³⁹ 朱迎平嘗言〈止齋陳傅良云〉節錄「關於試論認題、立意、造語、破題、原題、講題、使證、結尾的論述」；〈福唐李先生《論家指要》〉內容「包括論主意、論間架、論家務持體、論題目有病處、論用字法、論制度題、論人物題、全篇總論八節」；〈歐陽起鳴《論評》〉乃「分論頭、論項、論心、論腹、論腰、論尾六節」；〈林圖南《論行文法》〉「提出揚文、抑文、急文、緩文、死文、生文、報施文、折腰體、蜂腰體、調頭體、單頭體、雙關體、三扇體、征雁不成行體、鶴膝體等名目，並分別舉論文實例加以說明」。詳見同上註，頁 55。又針對呂祖謙《古文關鍵·總論看文字法》的著名論述：觀文須首看大概、主張，次看文勢、規模，再看綱目、關鍵，末看警策、句法云云，吳承學嘗解析道：「『大概』意為文章的整體，也就是『文字體式』，『主意』、『大意』，疑即『主張』之意，『文勢』指文章體勢，或指有氣勢」，「『規模』大概指文章的布局」，「『綱目』是指文章展開的主要線索」，「『關鍵』是指文章在『鋪敘次第、抑揚開合』等章法的緊要之處」，「『警策』正是指篇中『片言而居要』之處」，「『句法』是指遣辭造句、起結、剪裁、轉折等文字功夫」。詳見吳承學：〈現存評點第一書：論《古文關鍵》的編選、評點及其影響〉，收於章培恆、王靖宇主編：《中國文學評點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224-225。是類書籍的豐富度可見一斑。

始，再往前延伸到先秦漢魏晉文章，所謂大家文的雛形已然出現；再者，那些標識文章結構或文脈線索的評點法的使用，大大強化了講解的深度和廣度，有助提升讀者的學習效率。這兩個特點反映詞章學在內涵、方法面的充實與精進，確為該學的進步樹立了重要的里程碑。⁴⁰

回顧古文運動歷史，若蘇門師弟傳習間，已屢見取法大家文的講談。像是：論史、論事或論理各當摹寫何種詞章，還有敘述、議論的線索或架構可仿效孰家云云，且此等論述多為應試（蓋指策論）而發。⁴¹那麼後來呂祖謙等所為，即將諸前輩指點的路徑，闢建地更加便捷和通順。就後來的發展觀察，呂氏等選輯大家文且施以評點的作法，確實造成了眾多迴響：後起的文評家或文派屢屢襲用此法，其中運用地特別上手的，首推有明唐宋派諸賢。相關研究早注意到二者的密切關聯：如就《古文關鍵》影響面看，歸有光（1507-1571）《文章指南》裡的《歸震川先生總論看文字法》、《歸震川先生論作文法》「幾乎全抄自《古文關鍵》」；此外，唐順之（1507-1560）的《文編》、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所選篇目與《關鍵》重複率甚高，其間承襲關係不言而喻；⁴²再者，就明清時期文評家或文派藉（附評點的）選文集來發揮影響的現象觀察，歸氏的《史記評點》和茅氏的《八大家文鈔》確為箇中翹楚，而諸君所為，顯然是重彈《關鍵》等刊物就評析古文來指導時文的舊調。⁴³不過，唐宋派還有個特點值得重視，

⁴⁰ 《古文關鍵》選錄唐宋古文，《崇古文訣》溯及秦漢文，《文章規範》以漢晉唐宋為選文範疇，且三者皆有評點。詳見吳承學：〈評點形態源流〉，收於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84-390。

⁴¹ 像李廌（1059-1109）嘗提及老師蘇軾的教誨：「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令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云云。詳見〔宋〕王正德：《餘師錄》，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41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794。又黃庭堅（1045-1105）和洪芻（1066-1128）通信（二人除為師徒，更有甥舅關係），就應試課題（應指策論）提出「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觀摩學習彼者行文之「繩墨」該建議，好讓自家也能寫出「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的精煉詞章。詳〔宋〕黃庭堅：〈答洪駒父書三首〉，收於〔宋〕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收於王雲五主編：《四部叢刊正編》第4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頁203。

⁴² 吳承學：〈現存評點第一書：論《古文關鍵》的編選、評點及其影響〉，頁229-232。一般認為，「唐宋八大家」的稱謂和地位能在文學史上成立，就是唐宋派運作的成果。

⁴³ 陳平原：《中國散文小說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65-170。

那就是彼等論文乃從實際面上通精神面：一方面他們既持續照顧修煉文術好來作時文的需求，另一方面又昂首宣示我輩承繼了學文養氣、修德垂文的文統，也就是新儒學運動揭櫫的道統大纛。現實、道德面兼顧的主張，加上諸評注文集的推廣，遂讓唐宋派的聲勢遠播長流。

且讓我們就兩則文獻來說明唐宋派的論調。一是茅坤〈文訣五條訓繹兒輩〉裡的第三條：

三曰調格。格者，譬則風骨也。吾為舉業，往往以古調行今文。汝輩不能知，恐亦不能遽學。箇中風味，須於《六經》及先秦、兩漢書疏與韓、蘇諸大家之文涵濡磅礴於胸中，將吾所為文打得一片湊泊處，則格自高古典雅。⁴⁴

二是孫慎行（1565-1636）〈荊翁時義集序〉對唐順之時文價值的敘述：

如是翁精心理學，沉酣諸子史百氏，古文辭業上接八大家，而以其餘發之時義，蓋匠心精謹，律韻沖調。其平若規規帖括，而其高乃材人傑士之所不能措手……誦之宛然見聖賢之語氣，而循是以窺索聖賢之精神，值可以終身焉而不厭，歷千變萬化而莫能逾，然則是集也，直《六藝》之羽翼，非獨一代之規模已矣！⁴⁵

面對關係到唐宋派二員大將，亦即茅坤、唐順之其文論何如的兩段文字，首先我們須注意，它們皆針對時文課題而發：正如各自標題所顯示的，〈文訣五條訓繹兒輩〉乃茅氏在訓示諸時文要訣，〈荊翁時義集序〉則是孫慎行在引介或推薦唐氏時文集的好處。無論是訣竅的傳授，或是時文範本的刊行，不都是自仕途取決文章表現以來，對舉業深有心得的文評家都在做的事嗎！⁴⁶再來要緊的是，茅、孫所言實涉及新儒學運動的核心理論或根本信念，那就是學文養氣與修德垂文。原乎古文運動發展以來，諸健將所以特

⁴⁴ 〔明〕茅坤：《玉芝山房稿》，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05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年），頁136。

⁴⁵ 〔明〕孫慎行：《玄晏齋集五種》，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集部第12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頁145。

⁴⁶ 案茅坤訓示的五條要訣是：「認題」、「布勢」、「調格」、「鍊辭」和「凝神」。詳見〔明〕茅坤：《玉芝山房稿》，頁136-137。可見其廣度和深度。又孫慎行也開宗明義說：身為時文宗師的唐順之（亦為孫氏外祖父）是刻意書寫經義範文，好讓後學研習舉業的。詳見同上註。

別青睞含經書、兩漢書疏等經典詞章，除因彼者確有經世卓見而能拓展吾人眼界，論說亦淋漓精彩而足為範式，故尤有助於策論寫作外，當亦有取因爛熟諷誦、涵泳聖賢話語，從而在精神及涵養上產生的感染、陶冶效果。這就是所謂的「學文養氣」之術！像韓愈（768-824）的〈答李翊書〉、蘇洵（1009-1066）的〈上歐陽內翰第一書〉對自家修文過程的描繪，亦即：從一開始的與典範文章的齟齬難合，後來經過勉力強行的漫漫磨合期，終致我心同至道融釋浹洽遂得沛然吐辭云云，就是在詳述或見證習文確能養出聖哲胸次的親身經歷。⁴⁷韓、蘇等古文家的這種表述，爾後獲得理學家承認。惟彼等認為須將諷詠功夫集中在諸遺經上頭，好優先從聖人話語字句中涵養出聖賢氣象來，而無須過度鑽研文術，此等看法朱熹就曾清楚表達過。⁴⁸無論如何，貫穿新儒學運動諸階段（或古文、理學等陣營）的這種認識或主張，原就是教考選制度產生連番改動的指導力量。不論是展現見識的策論，或是闡釋經典義理的經義，或是代聖立言的八股文，其立意和初衷都在：讓舉子專務誦習典範文字，從而培養出類同聖賢的心智與德行。⁴⁹

⁴⁷ 「學文養氣」語出呂本中（1084-1145）《童蒙詩訓》，其謂：「韓退之〈答李翊書〉、老蘇〈上歐陽公書〉，最見學文養氣妙處。」詳見〔宋〕王正德：《餘師錄》，頁784。又韓、蘇二文皆因時文（蓋策論）寫作課題而發，分見〔唐〕韓愈：《韓昌黎先生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70；〔宋〕蘇洵：《嘉祐集箋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329-330。韓、蘇言及的因修文而修道的功夫歷程，即被呂氏稱作「學文養氣」。

⁴⁸ 案朱熹嘗就〈答李翊書〉評論韓愈，他肯認韓氏為文先深耕經術道德的主張，然否定他在文術上耗費過多精力。詳見〔宋〕朱熹：《讀唐志》，收於〔宋〕朱熹撰，徐德明、王鐵校點：《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收於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2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3370。另朱子嘗將〈答李翊書〉、〈上歐陽內翰第一書〉，還有柳宗元（773-819）〈答韋中立論師道書〉（這是另篇詳載古文運動主張的力作，緣起亦為回應時文課題。只見柳氏倡言須秉正氣行文，且須博參經傳佳文的道理）一併討論，他同樣判定諸健將花太多力氣在寫作上，從而提出理學家的修正看法，亦即：「今請歸家正襟危坐，取《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逐句逐字分曉精切，求聖賢之意，切己體察，著己踐履，虛心體究。如是兩三年，然後方去尋師正其是非，方有可商量，有可議論，方是『就有道而正焉』者。」這就經典用功以明瞭、實踐聖道的主張，後遂融入經義科考的執行。詳見〔宋〕黎靖德編，鄭明等校點：《朱子語類（五）》，收於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18冊，頁3812-3813。

⁴⁹ 茅坤嘗言：「僕嘗謂舉業一脈，蓋由王荊公厭唐宋來以辭賦取士，故特倡此經義以攬天下材茂之士。妄謂舉子業，今文也。然苟得其至，即謂之古文亦可也。世之為古文者，必當本之《六籍》，以求其至；而為舉子業者，亦當由濂洛關閩以溯《六籍》，而務得乎聖賢之精，而不涉世見，不落言詮。」詳見〔明〕茅坤：《復王進士書》，收於〔明〕茅坤：《茅鹿門先生文集》，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344冊

職是，茅坤在此揭示的要訣：作時文尤貴體現「高古典雅」的「調格」，而這得從諷誦、體味諸先哲文章以養胸懷處下功夫，還有孫慎行對《荊翁時義集》的推崇：就因唐氏能紮實學道而後垂文，故能做出承續道統、誦其文即宛若親聞聖賢在吐辭般的至極時文。凡此種種，都是紹述新儒學運動精神而談的高論。

當我們再次檢視戴震生活的時代，我們很清楚看到唐宋派扣緊作文實務，又正面呼應經義大義的論點，是如何廣被眾文派，左右諸文家信念。像是方苞（1668-1749）在應皇命製作的程文範本《欽定四書文》裡，遂標舉古文運動諸健將的旗幟，宣稱時文須兼顧「理」（指文章的內容和道理）、「辭」（指屬文的技藝與路數）和「氣」（指文家在論道行文時產生的精神、或情操的感染力，簡稱文氣）三者，且當分別就讀經窮理、取法三代兩漢詞章，還有「沉潛反覆於周秦盛漢唐宋大家之古文」這三個面向下功夫，以期文章上臻理「明」、辭「當」而氣亦「昌」的至境。此等宏論豈非取資唐宋派諸賢而來！⁵⁰又長時間講習舉業而受文壇尊崇的宜興儲氏家族，論文始終強調須紮穩古文根基，而非迎合考場風向投機行事，且好談「養氣」、「求真」、「古雅」與「理法」諸課題。聽來豈不也是唐宋派論調的持續回音。⁵¹還有同戴震一齊受學江、方二師的方矩，爾後嘗追隨劉大櫟（1698-1779）學習。富詞章素養的他每「遵唐歸之遺軌」來作時文，全然無顧世人「操速化之術，多竊窺科以去」的情勢。⁵²這些事例，無不說明唐宋派諸君所言已成文壇共識，且深刻影響著文士的理念和信念。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544。案茅氏所以將古文、時文一體對待，正因為他是按照古文健將和理學家的主張來看事情的。

⁵⁰ 〔清〕方苞：〈凡例（其二）〉，收於〔清〕方苞：《欽定四書文》，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390冊，頁4。又方氏嘗如是推崇唐宋派時文：「至正（按：德）嘉（按：靖）作者，始能以古文為時文，融液經史，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為明文之極盛。」（〔清〕方苞：〈凡例（其一）〉，頁3）可補充的是，方苞即「桐城方氏」代表人物。方燾如丟官時，方苞還嘗慰勉他當趁此機緣專務古文，實踐篤學而發為文采的正道。詳見〔清〕方苞：〈贈淳安方文翰序〉，收於〔清〕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收於王雲五主編：《四部叢刊正編》第83冊，頁101。

⁵¹ 陳水雲：〈清初宜興派的八股文批評：以豐義儲氏為討論中心〉，頁200-201。案陳文一路觀察儲氏家族核心成員，若儲欣、儲大文（1665-1743）和儲長文（1687-1770）等的論述，才得到這樣的結論。

⁵² 〔清〕劉大櫟：〈方晞原時文序〉，收於〔清〕劉大櫟：《海峰文集》，收於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8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21。

一路談到這兒，我們已了解戴震諸多行為，像是為應考且須修習詞章，為作好時文且須研治古文，還有為研習諸大家文，且須從事選輯、評析工作等等，其實無一不是彼時詞章學文化指引下的行動。對包含戴震在內的所有詞章講習者來說，舉凡觀文、鑑文的心得與洞見，或者習文、作文的要訣與講談，種種詞章討論多呈現在那施諸選文的評析或闡釋上。故在下文，且讓我們對批注、評點進行一番觀察，看看作為詞章學主要表現方式的它們，其特點、效果及意義為何。

（三）評點之學：往返文心、篇章字句間的揣度和推說

說到那些施諸選文的批注或闡述，我們一般用「評點」之學來稱呼。簡要說明，這指的是利用統稱作「點」的「圈、點、抹、畫等標示符號」，還有統稱作「評」的「夾注、旁說、眉批或尾論等語言文字」，來對選文進行評析、闡說的學問方式。⁵³它的興盛與流行，當然和科舉取決文章表現的歷史密切相干，故前文述及的那些旨在提煉作（時）文水準的書刊，若呂祖謙的《古文關鍵》、樓昉的《崇古文訣》及謝枋德的《文章規範》，到唐順之的《文編》、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及歸有光的《史記評點》等等，即無不藉此道來指點讀者。學界前賢嘗言：「科舉考試就像體育比賽，八股文就像規定動作的體操，比賽的場地、參賽的動作是統一的，但動作的難度、技巧、編排乃至完成的質量，其中的差異性都是非常大的，明眼人一目了然就可以判斷其水平之高下。」因此，「八股文的技法，就是一般中求特殊，簡單中求複雜，死板中求靈通，單調中求變化」，既「要別出心裁而又不離經叛道，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由於競爭者眾，如何能出奇制勝，脫穎而出，確是非常微妙的技法」。⁵⁴這譬喻極恰當！上述刊物，既強於擊析文章的敘述線索與層次結構，若抑揚、開闔、奇正、起伏等，的確能滿足

劉氏認為：方矩時文誠回應了朝廷取仕的用意和期許，亦即：「後代更創為八比之文，如詩之有律，用排偶之辭，以代聖賢之口語，不惟發舒其義，而且摹繪其神。所以使學者朝夕從事，漸漬於其中而不覺也。故習其業者，必皆通乎《六經》之旨，出入於秦漢唐宋之文，然後辭氣深厚，可侷文章之一體，而不至齟齬於聖人。」（〔清〕劉大櫟：〈方旂時文序〉，頁121）故他為方氏作序，好闡述時文正道。

⁵³ 張素卿：〈「評點」的解釋類型——從儒者標抹讀經到經書評點的側面考察〉，收於鄭吉雄、張寶三合編：《東亞傳世漢籍文獻譯解方法初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頁79-80。

⁵⁴ 吳承學：〈明代八股文〉，收於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頁234-235。

舉子的迫切需求。⁵⁵然須留心的是，就在諸評點在點醒某字眼如何關鍵，評說某句如何精彩、某段又怎麼高明的同時（由是讀者當如法炮製云云），文家立言當下的秉心凝神狀態，像是理念信仰、感觸關懷，還有忖量思慮等等，也有可能被觸及到。而一旦論及此等情事，評點之學就有了另番層次的意義。對此，且讓我們就兩個例子來進行說明。

孫漢孫的《檀弓論文》和康濬（1741-1809）的《孟子文說》，分別出版於康熙末及嘉慶初。就文獻性質看，它們都是藉評點範文來指導時文寫作的典型刊物。⁵⁶故在引介或行銷自家論著特色或利多處時，孫、康二人皆不吝侈論〈檀弓〉與《孟子》何以特別有助時文習作，若〈檀弓〉「所記多孔門威儀文辭」，「說理」既「精實幽深」，「議論波瀾」復「奇變百出」，分別有利《論語》文、《學》、《庸》文及《孟子》文的書寫。另外像是「單句排比、截講挨敘、起伏照應、虛縮吞吐、鉤聯映帶，凡制藝中大小題所有格局法律」，〈檀弓〉篇亦「無一不備」！由是多麼值得拜讀云云。⁵⁷還有具「（按：各）章自為篇」特質的《孟子》該書，文章「短篇精警，長篇壯潤」，時或「規行矩步，轉復馳騁不羈」，時或「細針密線，卻又劈瀆無痕。信是千古文章鉅觀」！且《孟子》諸文非但「前路」、「正面」及「後路」齊備，復擅用形色筆法，若「有正、有反、有虛、有實，有賓主順逆，又有托筆、幹筆，有補敘、有搜說、有指點引證與開障之法、塞漏之法」，故此等「洵乎無美不具，無妙不臻」的至文，豈不待吾輩潛心鑽研之。⁵⁸

⁵⁵ 案孫彥嘗舉唐順之例，論證取資諸大家文的謀篇布局法，確能提升經義水準。詳見孫彥：〈以古文之法入於時文——論唐順之的八股文創作〉，《船山學刊》2013年第4期，頁150-151。

⁵⁶ 侯美珍在討論明清時評點經書以當古文選本該現象時，即把《檀弓論文》、《孟子文說》放在《古文關鍵》一系刊物中介紹。詳見侯美珍：〈明清八股取士與經書評點的興起〉，《經學研究集刊》第7期（2009年4月），頁137-138。

⁵⁷ 〔清〕孫漢孫：〈孫氏家塾檀弓論文十則（之七）〉，收於〔清〕孫漢孫：《檀弓論文》，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102冊，頁565。且孫氏還說：「讀〈檀弓〉則於守溪（按：王鏊（1450-1524））、荊川（按：唐順之）之以古文為時文者，思過半矣。」鄭重保證〈檀弓〉包藏實用技法的好處。又《檀弓論文》序文，有康熙61年（1722）紀年（〔清〕孫漢孫：《檀弓論文》，頁563）。

⁵⁸ 分見〔清〕康濬：〈雜論十則（之一、之十）〉，收於〔清〕康濬：《孟子文說》，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8冊，頁255、256-257。康氏嘗言：《孟子》一書含「論為政」、「論古論事」，還有「隨事開導人」、「順便講就道理」等諸類文字，後開啟「唐宋人策略」、「史論」、「序說」和諸子等文章體製（〔清〕康濬：〈雜論

不過，就在此等推薦話語的前後，不約而同地，孫漢孫和康濬又為自家所以費心評點是二書做出申述。孫氏有云：

古人文成而法立，非執法以行文。但讀者不詳其賓主虛實離續順逆諸法，則莫測其神之所注。勢必害辭害意，謬戾紛錯，此鄭注孔疏舛誤多端也。故讀〈檀弓〉者，以體會神理為主，次之則當講明乎法。知其以法運神，則神之抑揚往復者愈出；知其以神御法，則法之變化出沒者不窮。規矩耶？巧耶？一而二，二而一者也。⁵⁹

康氏乃謂：

夫聖賢之書，雖小夫孺子皆知為載道之言，但以文求，鮮不非而笑之曰淺。願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苟不知其文理之作何承接，作何起迄，一言《孟子》，漫曰是言性善，是言仁義，縱有所見，終涉於隔靴搔癢。前人有言：所從遊師大善說書，不說道理，直說聖賢意之所之。今以古文說《孟子》，亦所以說其意之所之而已。得其意，則道理不說自在矣。⁶⁰

案孫、康二人的論點是相類的，他們認為：無論是在鑑賞某文的好處，或在研讀飽含精義的經典時，點評文術該事，看來都不會是最重要的。然若慮及「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之道，亦即立言者的用意心緒或精神氣魄，惟須透過語言，且尤其是書寫的適恰又自如的文章來傳述之的道理，評點之學遂將扮演某關鍵角色歟。所以當吾人在進行像是「賓主虛實離續順逆諸法」的講解，或是「文理之作何承接，作何起迄」一類考察時，即是在清理、擊析文家神理化為篇什的錯綜理路，或在追蹤、重演曩昔哲人動心吐辭的歷歷經過。要之，評點之學不再只是決勝科場的武器，就在諸析論、評述運作當下，評點總教讀者看清楚作文之道尤神祕莫測的地方，從而使人們明白名文為什麼好：至文總能上臻「神」既自如流轉、「法」亦自然運作的境界，還有感受到聖賢垂訓的淵深心迹，從而不再只會「隔靴搔癢」地漫說些道德名目。⁶¹

十則（之二、之三），頁 255-256）。這更從詞章學史的角度誇言《孟子》的價值。

⁵⁹ [清]孫漢孫：〈孫氏家塾檀弓論文十則（之五）〉，頁 564。

⁶⁰ [清]康濬：〈孟子文說敘〉，收於[清]康濬：《孟子文說》，頁 254-255。

⁶¹ 案孫、康所言透露出評點必然會涉及義理解釋的課題。其實早在南宋，該技術便成為理學家

攤開《檀弓論文》、《孟子文說》覽讀，我們確能看到諸多實例。像是〈檀弓〉篇的「子上之母死而不喪」一節，還有《孟子·公孫丑下》的「三宿出晝」章，孫漢孫與康濬即隨文布署了標識「段落」、「節次」的截：L、一，「精神團聚處」（或「文情勝處、文致佳處」）的連圈：○○○○，「注重之筆」的連點：、、、、，以及「要緊字句」的直抹：|、||（以上屬「點」範疇）；⁶²加上行間批（即旁批或側批）、雙行夾批、總批或尾論的穿插運用（以上屬「評」範疇），來解說二文何以精妙精彩。隨著貫穿「子上之母死而不喪」該節的「吞吐伸縮文法」的揭示及說明，孫氏論及文中主人翁子思（西元前 483-402）的隱微忖量：基於子上之母嘗犯大過，遂不讓子上為彼出母服喪。然因「聖賢處人倫之變，自處於厚」，故非但於出妻當時「使之以微罪行」，今日門人就問時，亦特以「微辭」含糊答覆，以維繫敦厚情誼，故成就了這段耐人尋味的問答。⁶³另外，透過對「三宿出晝」章孟子（西元前 372-289）話中，那「句句提，句句轉，句句頓，句句折」的特殊句式的揭曉，亦即：從「王如改諸，則必反（按：返）予」，到「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予然後浩然有歸志」，再到「予雖然，豈舍王哉」，再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最後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云云，這設問句、解釋句、告白句和傾訴句緊湊綴連，且終究投以期待的迂迴跌宕話語，康氏同樣說到孟子心坎處，披露他那始終冀望齊王追回他，教他有機會施行仁政、造福黎民百姓的心念和宏願。而正是這難以澆熄的用世情懷，才產生這一長段「沉鬱頓挫之致」的動人紆言。⁶⁴讀到這兒，我

表述經典意旨的重要方式，彼者的評點也被應用在準備經義考試的著作上。學界嘗透過呂本中、呂祖謙、朱熹，還有金華諸儒討論過這現象。分見吳承學：〈評點形態源流〉，頁 381-383；張素卿：〈「評點」的解釋類型——從儒者標抹讀經到經書評點的側面考察〉，頁 86-107。

⁶² 分見〔清〕孫漢孫：〈孫氏家塾檀弓論文十則（之九）〉，頁 565；〔清〕康濬：〈凡例五條（之三、之四、之五）〉，收於〔清〕康濬：《孟子文說》，頁 257-258。

⁶³ 〔清〕孫漢孫：《檀弓論文》，頁 568-569。關於「子上之母死而不喪」的緣由，歷來注疏有不同解說。孫漢孫謂遇眾說紛紜時，將「遵朱子教人涵詠白文之法以意逆志而得之」（〔清〕孫漢孫：〈孫氏家塾檀弓論文十則（之十）〉，頁 566），亦即他將涵濡體味經文，好仔細揣摩聖賢吐辭的真意。故他採納了孫鑛（1543-1613）《孫月峰先生批評禮記》「細玩此意，似是伯魚母過小，子上母過大」該揣測，而不取陳澧（1260-1341）《禮記集說》「伯魚喪出母，乃賢者過之之事」、或吳澄（1249-1333）《禮記纂言》「子思兄死，使白繼之，既主尊者之祭，則不敢服私親也」，這些更具學術分量的注疏的議論（〔清〕孫漢孫：〈孫氏家塾檀弓論文十則（之十）〉，頁 569）。

⁶⁴ 〔清〕康濬：《孟子文說》，頁 292-293。案康濬極推崇「三宿出晝」章，嘗言：「昔人謂

們赫然察覺：透過孫、康的評說，作為讀者的我們，還真進行了一趟深入文家(或文中主人翁)幽微心境的旅程，親眼目睹了彼者吐辭垂文的緣起始末。故評點之學往返文心、篇章字句間的揣說本事，看來真教人不敢小覷。

檢視從前歷史，唐順之說過這樣的話：

聖人以神明而達之於文，文士研精於文以窺神明之奧，其窺之也有偏有全有小有大有駁有醇，而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嘗不在焉。所謂法者，神明之變化也。⁶⁵

是以孫、康二人是有所承的：原來唐宋派宗師早把「法」貢在此乃「神明之變化」的至高位置，好為自己選輯名文並施以評點的行動做出解釋(或賦予價值意義)。無論如何，《檀弓論文》、《孟子文說》一類例子告訴我們：隨著評點之學的推展，形色章法文術將持續被開發和討論，這除能源源供應舉子所需裝備外，在淋漓闡說的同時，確能教彼者深刻體會名家名篇的好處。更要緊的是，正如唐文所言：當諸學文者在研討文法之際，即便步調不一、成效有別，他們都已踏上繼武聖賢至文的道路上。當代代習文者無不以先哲斯人為楷模，悉心學習斯文如何「以法運神」、或「以神御法」，揣摩著該怎麼教自家「神明」也能「達之於文」時，新儒學運動標榜的學文養氣、修德垂文諸理念，也將隨之傳衍不絕歟。⁶⁶

左氏敘四大戰為四大篇，《孟子》亦有四大篇：保民章、動心章、行助章、並耕章。四章章法不同，而精深博大，變化跳脫，各臻絕頂。其他若反手王齊、三宿出晝、傳質為臣等章，其曲折淋漓，尤覺一往情深。」(〔清〕康濬：〈雜論十則(之九)〉，頁 256) 且他還援引偽託蘇洵的《殊批孟子》的批語：「懷形於詞意之表，整而不整，亂而不亂，纏綿懇惻，〈離騷〉似之。」(〔清〕康濬：《孟子文說》，頁 293) 來強化說明該章的特色與精神。

⁶⁵ 〔明〕唐順之：〈文編原序〉，收於〔明〕唐順之：《文編》，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316 冊，頁 103。

⁶⁶ 可補充的是，康熙年間的文評家過珙也主張：藉由對諸名文「竅要段落處」的「點醒」和「詳註」工作，確能幫助讀者掌握範文「肯綮所在」，從而教人「涵詠其神趣，玩味其節奏，自得精意於語言文字之外也」。總之，透過對諸文章法、精神的熟稔與內化，過氏以為自家文章亦將上臻「骨格高古，氣息宏深」境地，得「與秦漢唐宋元明諸君子並垂不朽矣」。詳見〔清〕過珙：〈原序〉，收於〔清〕過珙：《古文評註》(臺中：曾文出版社，1975 年)，頁 1-2。須注意的是，縱使詞章家為評點行動賦予這麼高的意義，此舉畢竟和利祿之途密切相干，故也屢遭世人的譏諷。對此，侯美珍嘗評述這些批評，若：貶經為文、妄議經典，及造成圖書分類的混淆等，還有評點者陣營的回應或辯護，如：訴諸典籍乃文章始祖(故理應鄭重評述其文章價值)，或可以文誘人、讓人因文而明道等。詳見

眼光回到戴震，為應考方鑽研詞章學的他自然會對可資舉業利用的技法相當留意。若他嘗言：「文有二種，一則題如大堅石，作者用大於石之鐵椎，一椎粉碎，此一奇也。一則用口氣一吹噓，便使大石軟如綿，飛舞空中，飄墮無迹，如吾此作是也。」⁶⁷可見戴氏對諸時文文法的嫻熟和自信程度。然在另一面，他不也透過《唐宋文知言集》的編輯，樹立起高高的文章品第，亦即「理與辭俱無憾」，來寄寓對自家文章的期許嗎！⁶⁸由是，戴震會怎麼對另座文章高峰，也就是辭賦之祖《屈賦》進行評述，他將會怎麼揣度屈子心緒，又會怎麼闡說其鴻文云云，遂益發引起我們的興趣了。

四、作為典型古文詞章學論著的《屈原賦注》

談到《屈原賦注》，正如前引盧文弨〈序〉和戴震〈自序〉所言：該注展現了注家頗自負的考核之功。⁶⁹故在其中，我們確能看到像是文字、聲韻、天文地理和名物制度等專家之學，還有戴氏尤擅長的參驗手法的運作事例，無怪其詮釋每能臻至「文從音順，怡然理達」之境。嘗有學者舉證：針對〈離騷〉「固時俗之工巧兮，偈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寧溘死而流亡兮，予不忍為此態也。鷲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云云，戴震援同音假借之道及《漢書》例佐證，遂以「讓」釋「攘」（二字皆日紐陽韻，聲近字通），從而流暢串講全章旨

侯美珍：〈明清八股取士與經書評點的興起〉，頁 153-157。案該現象即「以時文為古文」之譏。相關情形，可參考黃強：〈明清「以時文為古文」的理論指向〉，《晉陽學刊》2005 年第 4 期，頁 96-98。

⁶⁷ 〔清〕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頁 182。

⁶⁸ 案「知言」源出《孟子·公孫丑上》的「知言養氣」章，原是孟子對為政者辭令進行的心術考察，即所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云云。詳見〔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收於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 45 冊（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92。古文運動興起後，「知言」遂被用在對大家文風格神韻的品鑑上。若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對《孟子》、韓文及歐文的評述即是。詳見〔宋〕蘇洵：《嘉祐集箋註》，頁 328-329。《唐宋文知言集》的「知言」用法，蓋承古文先輩而來。

⁶⁹ 可補充的是，時人嘗慫恿戴震刊行諸青年時期論著。考慮到《考工記圖》尚有修訂空間、《句股割圓記》須針對專家發行等問題，戴震未鬆口允諾。惟對已成一家之言的《屈原賦注》，他信心滿滿地推薦，其自信蓋與考據學力的展現相干。詳見〔清〕程瑤田：〈五友記〉，收於〔清〕戴震撰，楊應芹、諸偉奇主編：《戴震全書》第 7 冊，頁 42。

意道：「言不忍為時俗工巧，誠如鷺鳥不羣，方圓易道，寧受（按：「忍」、「讓」意）一時之尤詬，而為前聖所取也。」誠然「文從音順，怡然理達」。⁷⁰相較之下，戴震對自家詞章學素養在《屈原賦注》中扮演何等角色，卻鮮少花筆墨說明。這是因為此等學力乃受文化潮流影響，時人習以為常，不若甫發展（且備受矚目、期待）的考據學值得大書特書？或因標榜詞章之功會讓該書被歸類成時文研習刊物，反降低著作的品第價值？⁷¹原因一時很難講明白。不過就像前言指出的：戴震注騷嘗下的功夫，若對篇章結構的認真分析、對藝術效果的淋漓批注，以及每將字詞置諸語境來解說云云，此等努力終究很難被世人忽略。

據考，戴震初注《屈賦》原是注釋、通釋和音義三者混同，且羅布批注的。待定稿後，《屈原賦注》遂由計 7 卷的「關於《屈賦》二十五篇的詮釋義疏」、計 2 卷的「關於《屈賦》山川地名及草木鳥獸蟲魚的通釋」，以及計 3 卷的「關於《屈賦》各篇字詞的意義、異文，並附〈通釋〉的意義」三個獨立部分組成，且因某些考量刪去了批注。於義疏外，戴震特地分立出通釋和音義，這當然是為了強調研經考核之功。⁷²然著眼占 7 卷分量的義疏部分，其中那些精要的字詞解釋固是亮點，但戴注更多的篇幅根本是花在這文章評析上頭，且還是用按章、分段開講，時或以總論冠之、尾論束之的詞章學形制。若再將《初稿》那一條條洋溢著文藝才氣、表露出鑑賞功

⁷⁰ 「文從音順，怡然理達」云云，語出徐道彬論文闡述劉永濟《屈賦通箋》多承戴震因聲求義法處。針對以「讓」釋「攘」例，徐氏還指出：戴震的解釋遂讓「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那意思相近的「屈」與「抑」、「忍」與「攘（讓）」兩兩一組的句式得清楚呈現。詳見徐道彬：〈戴震《屈原賦注》的小學成就論述〉，《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0 卷第 2 期（2006 年 3 月），頁 87、89。另黃建榮亦嘗就語文學史角度發明《屈原賦注》的成績。詳見黃建榮：〈戴震《屈原賦注》的字詞注釋特色〉，《東華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3 卷第 1 期（2004 年 3 月），頁 57-61。

⁷¹ 像林雲銘《楚辭燈》即遭四庫館臣批評：「是編取《楚辭》之文，逐句詮釋。又每篇為總論，詞旨淺近，蓋鄉塾課蒙之本。江寧朱冀嘗作《離騷辨》一卷，攻雲銘之說甚力。然二人均以時文之法解古書，亦同浴而譏裸裡也。」詳見〔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4 冊，頁 3821-3822。案館臣以博綜經史自詡，在他們看來，是類著作不過是時文講義。總之，詞章家屢遭「以時文為古文」，或「以時文之法解古書」的譏諷。

⁷² 分見蔣立甫：〈《屈原賦注初稿》說明〉、〈《屈原賦注》說明〉，收於〔清〕戴震撰，楊應芹、諸偉奇主編：《戴震全書》第 3 冊，頁 533、607。關於音義和通釋的價值，蔣氏嘗言：戴注〈音義〉體例仿自陸德明（550?-630）《經典釋文》，「其音讀、校勘、考證文義故實，可取者甚多」，又「〈通釋〉釋山川名物，本是戴氏專長，所言多有根據，足資參證」（蔣立甫：〈《屈原賦注》說明〉，頁 609）。

力的眉批和夾注納入討論範圍，我們若說《屈原賦注》是部典型的詞章學論著，看來並不會是太誇張的事。

那就詞章學角度來說，《屈原賦注》（含《初稿》）討論了哪些事情呢？像〈天問〉裡的「穆王巧梅」和「初湯臣摯」，戴注分別有「鍊字之法」、「字法」兩條眉批，此蓋為標識《屈賦》擇字、序詞之精煉。⁷³另像〈雲中君〉的「森遠舉兮雲中」以及〈國殤〉的「帶長劍兮挾秦弓」，戴注分別有「賦雲傑句」、「有此造句，纔能壯其武厲」兩條眉批，這當然是在稱許《屈賦》賦物每能栩栩刻畫物貌、造句亦頗能生動體現神韻歟。⁷⁴除卻此等字詞、文句層面的評述，戴注尤費心力處，其實就在擊析文術，好逆溯、體味紆言者的情志感懷，這眾文評家無不專務從事的要事。舉例來說，像〈九歌〉的〈湘君〉、〈湘夫人〉，還有〈大司命〉、〈少司命〉這兩組賦，戴注即分別以「託為巫與神期約，而候之不至」、「託於與司命離合為辭」是二「託言」，來標注其間章法。⁷⁵案所謂「託言」（或作「托言」、「設言」），乃虛擬某情境、狀況，好托付作者意念情懷的文學手段。它普見於《詩經》和騷賦中，且為歷來注家發現和討論。⁷⁶戴注既能明白標識，亦即二〈湘〉訴諸的：神未來赴約、徒教彼巫者苦苦等待，還有二〈司命〉設定的：巫與神嘗形影相從、如今卻離隔不偶這兩種情狀，遂能串講諸章的曲折文思，若〈湘君〉首章：「此章託為巫與神期約，而候之不至，故曰湘君猶豫不行，為誰留於中洲乎？我脩飾美好，乘舟往迎，則願無波濤之險。且行且望，以君之未來，吹參差思之，當復誰思也？」以及〈湘夫人〉首章：「此亦託為巫與神期約而候之不至，故曰『帝子降此北渚』矣，意（按：臆測）之之辭也。繼曰望之踰遠，使我心愁，但見秋風水波及木葉落，不與神遇也。」還有〈大司命〉終章：「言今雖與神離隔，尚未至有虧道相絕也。願若今之無虧，則（按：爾今之）離而未必不可（按：有來日之）合耳。皆欲親之之辭。因又言即此離合之不偶，固命有當然，非人（按：力）所得為，以結前得

⁷³ 分見〔清〕戴震：《屈原賦注初稿》，收於〔清〕戴震撰，楊應芹、諸偉奇主編：《戴震全書》第3冊，頁603，校注20、24。案《戴震全書》為排版方便，遂將《初稿》諸眉批改成校注。

⁷⁴ 分見同上註，頁580，校注4；頁581，校注20。

⁷⁵ 分見〔清〕戴震：《屈原賦注》，收於〔清〕戴震撰，楊應芹、諸偉奇主編：《戴震全書》第3冊，頁634、639。

⁷⁶ 詳見陳志信：〈論戴震「觸事廣類」的研《詩》方法〉，頁127。

相從而後離居之意。」以及〈少司命〉末章：「此章言己之愁苦思神，而為離合之感者，非有私意干之，特望其為民正耳。」⁷⁷這麼一來，潛伏二〈湘〉、二〈司命〉裡的心緒，也就是屈子那再怎麼被辜負，卻始終竭誠事君、並期盼朝政導向正軌的心念便被揭露出來了。⁷⁸

覽讀整部《屈原賦注》，是類例子並不罕見。若戴震嘗評析〈山鬼〉末三章道：

三章之次：（按：山鬼）始望其（按：公子）來，曰意者君思我而不得聞乎；繼望之不來，則莫必其思我，而疑信交作也；終望之甚，曰徒我思君，如此離憂耳。⁷⁹

的確是頗細膩的分析。且看賦中主人翁（也是紆言者）山鬼從始相信到疑、信交作，到終究興起濃濃騷愁的心緒線索，誠被戴注徹頭徹尾摸索個究竟。又針對〈天問〉開端的總論，戴震亦嘗如是開釋：

問，難也。天地之大，有非恆情所可測者，設難疑之。而曲學異端往往驚為闕大不經之語，及夫好詭異而善野言，以鑿空為道古，設難詰之。皆遇事稱文，不以類次，聊舒憤懣也。⁸⁰

這確是對〈天問〉頗適切的介紹。案戴注先就〈天問〉內容，闡述該賦或者疑難普存天地間的莫測情狀，或者詰難諸「曲學異端」及「好詭異而善野言」者的述古妄言，接著指出〈天問〉遂由那一章章「遇事稱文，不以類次」的問難連綴構成。而這不成章法的章法，恰恰反映屈子紆言當下「聊舒憤懣」的心理狀態。⁸¹要之，時能節節分解（若〈山鬼〉末三章），時能

⁷⁷ 分見〔清〕戴震：《屈原賦注》，頁634、636、638、641。

⁷⁸ 案《屈原賦注·湘君》尾論云：「屈原為歌辭，託意於神既不來，巫猶竭誠盡忠思之，用翰寫其事君之幽思如是也。」〈大司命〉尾論謂：「懷王初甚任屈原，後乃以讒疏黜之，故二歌（按：二〈司命〉）並託於與司命離合為辭。天之司命，亦猶下之居位大臣，所以有『與君齊速』（按：〈大司命〉）及『宜為民正』（按：〈少司命〉）之語。」分見〔清〕戴震：《屈原賦注》，頁635、639。故戴震認為諸賦或傳達屈子事君的忠誠，或表達他對權臣主政須遵循正道的期許。

⁷⁹ 同上註，頁643。

⁸⁰ 同上註，頁647。

⁸¹ 所謂「曲學異端」或「好詭異而善野言」所言，指的是先秦的宇宙異方論述。原來注謂：「當時如鄒衍之流，著書多怪異，《山海經》、《淮南鴻烈》蓋本之。」又〈天問〉首句「曰遂古之初」，原眉批謂：「以誰字、何字、孰字、焉字、安字、幾字、胡字，錯綜上下為

籠統概述（若〈天問〉總論），戴注分寸拿捏得宜的詮說，確能照見《屈賦》各篇特色。

在 25 篇《屈賦》中，戴震用力最深、取得成就也最大者，自然首推〈離騷〉斯文。面對屈子那纏綿又闊肆的滔滔吐辭，只見戴震透過 10 則段旨評說，來掌握該鉅製的「全局血脉」（姑套林雲銘用語）。它們分別是：

第一段：自敘生平大略，而終於君之信讒。後四段乃反復推明之。

第二段：申言被讒之故，而因自明其志如此。

第三段：言君信讒之故，而已終不隨流俗，以申前意也。

第四段：設為退隱之思，言事君雖不得，而好脩不變，亦以申前意。

第五段：借女嬃之言而因之陳辭。言熟觀古今治亂，得其中正之道如是，此所以與世不合之端，己必不可變者也，申前未盡之義。

第六段：託言往見古先哲王之在天者以自廣，卒沮隔於飄風雲蜺，欲進不遂，因以歎溷濁之世，大致如斯。

第七段：託言欲求淑女以自廣，故歷往賢妃所產之地，冀或一遇於今日，而無良媒以通己志，因言世之溷濁，無所往而可者。

第八段：命靈氛為卜其行，而因念世之棄賢如此。

第九段：既又（按：因巫咸轉告神諭，得）聞吉占之故，而復審之於己，言不獨世棄賢，邇所稱賢者，亦往往因之自棄，惟己則不隨流俗遷改，計有去此而已。

第十段：託言遠逝所至，幽思不解，志在睠顧楚國終焉。⁸²

真是簡要又洗鍊的提點。稍稍研究這 10 則評析，我們不難發現它們呈現出 1-5 則、6-10 則各成一大單元的狀態。換言之，戴震蓋將〈離騷〉切為前、

章法，皆從一『曰』字生出。」對〈天問〉這難究章法的奇文來說，這總括性的提點大抵是恰恰適當的。引文分見〔清〕戴震：《屈原賦注初稿》，頁 583；頁 601，校注 1。

⁸² 分見〔清〕戴震：《屈原賦注》，頁 617、618、619、620、622、623、625、626、628、629。

後兩半，那就是：用來「自敘生平大略，而終於君之信讒」的首段，以及為反覆申述自家心志、信念，遂透過兩段記敘（即2、3段）、兩段設言（即4、5段）來取得多次紓言機會的上半篇；還有面對已不見容楚國朝廷的事實，遂用兩段託言（即6、7段）、兩段就問（即8、9段），來輾轉展開去國遠逝之馳想（即末段）的下半篇。透過戴注這前五則、後五則各成單元的評說，對照〈離騷〉文句，我們確能提綱挈領地重述斯文梗概。且看：屈文始於自敘其降生之美、脩飾之勤，然竟遭受被讒見疏之命運，於是透過兩次究明（被讒見疏）緣故的申述（亦即：羣小結成黨人，認定君子將與其爭利，遂進讒言毀謗。加上生逢散漫不循法度的君王，遂不能明辨忠奸云云），還有即便退隱、即便遭致女嬃責備，仍勤於脩飾且堅信古來治道的兩段設言，來反覆表明自家好脩不渝的心志，還有植根歷史教訓的學養（以上前半篇）。然志向再怎麼堅定，也無能改變政治現況，屈子的文思遂進行了多次馳騁想像：先是為獲認同及渴望有賢士為伴而進行的，那尋訪先代哲王和追求淑女的兩段（虛擬）行程，再來是為確定去國遠行念頭，遂透過巫咸、靈氛就問神諭的兩段（虛設）問答。隨著對世局濶濁及楚國政權確已敗壞至極該事實的認清，賦文終於進入遠逝自疏的（想像）旅程，然這不過是聊以銷憂的行動，全文遂在瞥見故都的悲愁中戛然而止（以上後半篇）。

案戴震嘗對「離騷」名義做出這樣的解釋：

離，猶隔也。騷者，動擾有聲之謂。蓋遭讒放逐，幽憂而有言，故以「離騷」名篇。⁸³

按照這個定義，〈離騷〉就是「遭讒放逐」的屈子，因心靈的不住騷動、騷擾，遂放言出聲所完成的篇什了。那上述戴震的章法評析，亦即略可分作上半篇明志、下半篇馳想，且由諸記敘、託言（或設言）錯綜構成的說明中，究竟凸顯出關於斯人斯文什麼事情呢？我們認為戴注申明了兩件要事：第一，騷愁滿腹的屈子（於前半篇）其實只是在反覆申明自己的好脩志向，及所堅持的事君正道，故他從未出言表達對楚君的怨懟；第二，有關（後半篇的）訪哲王、求賢妃，還有就吉占決意遠遊等形色描寫，不過是一段段為寬慰心靈、或聊以紓憂的虛構設想，換言之，屈子實未輕言拋棄君王。

⁸³ [清]戴震：〈音義〉，收於[清]戴震：《屈原賦注》，頁715。

既未嘗出言埋怨，亦不忍真的絕君遠去，故〈離騷〉從頭到尾，就只是個懷抱至純忠心的孤臣在作離愁抒懷罷了。這樣的發現，就是戴震注騷獲得的珍貴成果。⁸⁴

當然，戴震此番詮說實有需克服的多重困難，那就是他明顯違背了《楚辭》歷來重要注疏，若王逸（89?-158）《楚辭章句》、洪興祖（1090-1155）《楚辭補注》，還有朱熹《楚辭集注》的解釋：依諸前輩所言，〈離騷〉確有怨懟之意及別求賢君的打算！而戴震的處理方式，恰恰就是訴諸更周備謹嚴的章法分析，來指出或指正諸舊注的謬誤。最明顯的像是〈離騷〉首段（姑就戴注的分段）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莫。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也」，還有「惟黨人之媮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予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云云，王、洪及朱注皆主張這些話是就楚王諸多作為說的，像是：國君何「不肯當年德盛壯之時，棄遠讒佞也」（或「何不及此年德盛壯之時，棄去惡行，改此惑誤之度」），「任賢智」以成就善政（或「乘駿馬以來隨我，則我當為君前導，以入聖王之道也」），還有：「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或「皇輿宜安行于大中至正之道，而當幽昧險隘之地，則敗績矣」）。⁸⁵依照這些解讀，屈子所言確對君王的失德和謬行表露不滿。然戴震在顧慮到〈離騷〉上半篇，旨在反覆申言好脩不渝之志該前提下，遂透過各章評析來重新串講旨趣，若「恐美人之遲莫」、「撫壯而棄穢兮」及「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也」云云，乃屈子在期勉己當趁青春年華「及時好脩」，還有己欲「導後來之賢士以先路也」，以期能與眾賢一同匡輔國政的意思；又「惟黨人之媮樂兮」、「恐皇輿之敗績」云云，也不過是一路在「泛論人、己之事」耳。⁸⁶此外，戴注還嘗積極利用眉批，好適時驗證自家說法，若於「紛吾既有此內美兮」處云「『重之以脩能』、『好

⁸⁴ 《屈原賦注》擅就文闡發屈子情志該特色，林潤宣嘗作過簡要發明。詳見林潤宣：〈論戴震注《騷》的原則與特點〉，《遼寧大學學報》1999年第5期，頁95-96。

⁸⁵ 分見〔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7、8；〔宋〕朱熹：《楚辭集注》，收於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19冊，頁22-23。

⁸⁶ 分見〔清〕戴震：《屈原賦注》、《屈原賦注初稿》，頁616、540。戴注謂：「草木零落，美人遲莫，皆過時之慨，即《論語》（按：〈子罕〉）所云『四十五而無聞，斯亦不足畏』是也。」（〔清〕戴震：《屈原賦注》，頁616）故他判定此等話乃屈子在表達己當及時脩德，而非指責楚王。

脩以為常』，是一篇之主」，於「惟黨人之偷樂兮」處云「君之疏已皆由黨人，故先入黨人，通篇反覆言此，不敢對君也」；時或細膩闡發屈子的委婉吐辭，若於「忽奔走以先後兮」處云「說到君便住。若因黨人帶出，又祇云『信讒』，立言婉曲之至」；有時他更直接用夾注來攻擊諸舊說的失當，若於「不撫壯而棄穢兮」該章注曰「舊指君說，一啟口便彰君之穢誤迷惑，非是」，於「惟黨人之偷樂兮」及「忽奔走以先後兮」二章，各別注曰「舊皆指君說，少從容宛轉，非立言之敘」，還有「屈子述其不得于君，祇『荃不揆余之中情』二語爾。歸其罪于黨人之進讒，而君不清澄其然否，未嘗一語對君也」。⁸⁷總之，藉助種種就詞章學養詳密解說的功夫，還真讓戴震在諸《楚辭》注疏權威外闢得另條詮釋蹊徑。

同樣重要的，還有下面三處地方。它們分別是：以「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領句的第4段，以及第5段「就重華」所「陳辭」中的「夏康娛以自縱」該句，還有藉第6、7段的上天庭、求淑女展開的下半篇。舉凡此等章節，王逸、洪興祖和朱熹皆有說法：若「悔相道之不察兮」云云，意謂：「言己自悔恨，相視事君之道不明審，當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己之志也。」（或「異姓事君，不合則去；同姓事君，有死而已。屈原去之，則是不察於同姓事君之道，故悔而欲反也」）「夏康娛以自縱」云云，意指啟子太康放縱失德該事；又上天、求女之說，乃屈子自謂欲「求索賢人（按：或賢臣），與己合志（按：同心）者也」（或要離開楚國別「求賢君」耳）。⁸⁸然在戴震看來，此等說法皆無法吻合〈離騷〉的縝密章法或獨特句法。故戴注或以夾注直謂：「王《注》、《補注》皆以迷誤欲去，悔而還返為說，于前三段中則無根，於本節語意則倒亂，失其指矣。」好申訴諸舊說不及己說來的妥當：因自家「設為退隱之思」該說，既能呼應2、3段「進而事君」旨趣，亦能流暢申說本段章旨耳；⁸⁹或藉上下文諸句來證明「康娛」二字為連文，

⁸⁷ 分見〔清〕戴震：《屈原賦注初稿》，頁560，校注1、4、5；頁539、540。最後一條夾注，戴震還參較它篇，證明屈子未嘗出言怨對：「〈惜往日〉篇云『雖過失猶弗治』，則屈子于君，且有感恩之辭，愈覺舊說直而近對。」（〔清〕戴震：《屈原賦注初稿》，頁540）

⁸⁸ 分見〔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16、21、27、30；〔宋〕朱熹：《楚辭集注》，頁30、33、34。

⁸⁹ 分見〔清〕戴震：《屈原賦注初稿》、《屈原賦注》，頁545、620。案「悔相道之不察兮」處原有眉批：「此段更轉出一層，上兩段申明首段『信讒』二字，皆言其進，此則言其退。」

好發掘、發明屈子所學（且信奉不渝）的興衰治亂之道，亦即：先代聖王每每「祇敬」治民，故「天為之篤生賢哲佐之」，昏亂之君卻屢屢「康娛」放縱，最終將自取敗亡云云；⁹⁰或者透過彼此照應的段章評說，申言〈離騷〉後半篇包括「往見古先哲王之在天者」、「歷往賢妃所產之地，冀或一遇於今日」，乃至「命靈氛為卜其行」、「既又（按：於巫咸處）聞吉占之故」，到最後「仍託之求女」的遠逝旅程等等，無非是屈子面對已不見容楚國的現實，遂進行渴望有伴侶認同的連串託言想像，好否決前人謂屈子絕君遠去的說詞。⁹¹由是，透過這些主要取決章法考量的解釋，加上那些不時出現的，用來標識辭氣變化的眉批，像是提示辭氣戛然中斷的「頓挫」，或者文氣將別從它處發端的「折轉」等等，⁹²戴震確能一一化解了對他不利的解說：即屈子心存怨懟、出言埋怨，嘗欲棄君遠去云云，既深刻又生動地闡發屈子的迂曲文思和波動情緒，從而圓成了他的一家講談：那就是〈離騷〉確為一介心志、學養皆至純的忠臣，在面對舉世惟己好脩不渝、亦惟己徒抱輔君共成美政理想的情（窘）況下，在娓娓吐露、款款陳說他對君王、對家國的無盡情思歎。

〔清〕戴震：《屈原賦注初稿》，頁 561，校注 16）這亦在申述〈離騷〉2、3 段已言進而事君，遂於第 4 段轉為設言隱退的章法設計。

⁹⁰ 〔清〕戴震：《屈原賦注》，頁 621-622。案戴震指出「夏康娛以自縱」、「日康娛而自忘兮」以及「日康娛以淫遊」共計 3 句，足證「康娛」為連文的形容詞。故「夏康娛」云云乃泛指後王「康娛自縱以致喪亂」。該句式的確定，讓戴震能發明屈子陳述的古今治亂之道，亦即他引述自方矩的說法：「三代之興也如此，其亂亡也如彼。無他，祇敬、康娛之分也。」分見〔清〕戴震：《屈原賦注初稿》、《屈原賦注》，頁 547、621。

⁹¹ 分見〔清〕戴震：《屈原賦注》，頁 623、625、626、628。案戴注下半篇的章法解釋，最重要的依據，就是在上天、求女之後，及與靈氛、巫咸對答前的四句話，所謂「閨中既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云云。戴注謂：「此章承上起下之辭。言欲求淑女，則閨中深遠，欲見古哲王，則哲王不知，安能與溷濁之世久居乎？是以思遠逝以發其情也。」該四句既被視作承上啟下的關鍵，其講法遂能證成。故他嘗以夾注申言：「王《注》以求賢說，《集注》以求君說，皆失其指。」分見〔清〕戴震：《屈原賦注初稿》，頁 554、550。

⁹² 戴震注騷最常標識的辭氣，就是「頓挫」和「折轉」。像「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鎖兮，日忽忽其將暮」該章，「忽忽」句上即有眉批「頓挫」；「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該章，「雲霓」句上眉批則為「折轉」。又末段「陟陛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該章，「蜷局顧」句上眉批作：「一折轉便住，情辭痛絕，更不能著一語。」亦即折轉後辭氣本不能再發端，卻因情思甚痛不得止住耳。案此等眉批，確能引領讀者更有感地詠誄騷文。分見〔清〕戴震：《屈原賦注初稿》，頁 561，校注 23、24；頁 562，校注 42。

一路談到這兒，是到了該好好讀戴震〈自序〉的時候了。該序全文作（為討論方便，姑分成三小節）：

《漢（按：書）·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自〈離騷〉迄〈漁父〉，屈原所著書是也。漢初傳其書不名《楚辭》，故〈（按：藝文）志〉列之賦首，又稱其作賦以風，有惻隱古詩之義。至如宋玉已下，則不免為辭人之賦，非詩人之賦矣。

予讀屈子書，久乃得其梗概，私以謂其心至純，其學至純，其立言指要歸於至純。二十五篇之書，蓋經之亞。

說《楚辭》者，既碎義逃難，未能考識精核，且彌失其所以著書之指。今取屈子書注之，觸事廣類，俾與遺經雅記合致同趣。然後謗涉之士，諷誦乎章句，可明其學，睹其心，不受後人皮傳用相眩疑。書既成稿，名曰《屈原賦》，從〈漢志〉也。休寧戴震。⁹³

覽讀斯文，很清楚地，戴震是就《屈賦》的特質，還有為何要作注這兩點，來引介或行銷自家《屈原賦注》的好處和價值。故（第1節）開頭援引《漢書·藝文志》的敘述，把25篇《屈原賦》從《楚辭》重新析離出的舉措，並非只是為了恢復文獻原貌，申明屈子「作賦以風（按：諷）」、諸賦「咸有惻隱古詩之義」云云，才是戴震的主要用意：亦即《屈原賦》類同變風、變雅，寄寓著詩人的憂國情懷及欲匡救世局的冀望。故25篇《屈賦》乃絕非「辭人之賦」得比擬的《詩經》遺緒耳！⁹⁴又〈藝文志〉對《屈賦》質性的界定，恰恰就是戴震誦讀後的感受：諸賦確為一介「心」、「學」乃至「立

⁹³ 〔清〕戴震：《屈原賦注》，頁613。

⁹⁴ 案《漢書·藝文志》闡述詩賦略大義，是就春秋禮樂崩壞，賢士不得重用云云，來闡述荀子（西元前313-238）、屈原的作賦緣起及特色的。亦即：斯二賢賦作皆寓諷諭用意，「咸有惻隱古詩之義」，此等「詩人之賦」絕非爾後賦家，若宋玉（西元前298?-222?）、唐勒（約西元前290-223在世）、賈誼（西元前200-168）、枚乘（西元前?-140）、司馬相如（西元前179?-118）和揚雄（西元前53-西元18）等「競為侈麗闕衍之詞，沒其諷諭之義」的賦作得比擬。參見〔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756。有關變風、變雅的由來和精神，〈詩大序〉申言諸詩乃生逢濁世的詩人，「見時世政事，變易舊章，即作詩以舊法誡之，欲使之合於禮義」（此孔疏釋語）所為者。詳見〔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收於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5冊，頁16-18。屈原遭逢的局勢及他欲匡正君主、國政的用心，實類同曩昔詩人。

言指要」無不歸於「至純」的忠臣所為。是以「二十五篇之書」確為「經之亞」也（至此第 2 節）。惟《屈賦》這植根古來諷諭傳統、追步經典深意的精神和特色卻不被歷來注疏掌握，這便促使戴氏投身注騷，欲憑藉他「觸事廣類」的考核學力來究明諸字句、名物的確切意義，好引領讀者諷誦諸賦，深入體味隱伏章句間的情志或情思（至此第 3 節）。

案戴震斯序特別引起我們注意的地方，是他藉指稱或指控諸舊注每每「碎義逃難，未能考識精核」，遂「彌失其（按：屈子）所以著書（按：《屈賦》）之指」該問題，好申揚他頗自負的研經考核之功：亦即已注每能詳考字詞、名物之淵源，且能備陳經史證據云云。然同樣擔負究明屈子真心及諸賦真意任務的，豈不包括本節討論的，那些訴諸詞章學證據的諸多論述嗎！換言之，教《屈原賦注》有別從前那些不成系統、解釋亦含混粗疏的《楚辭》注疏的，其實正是匯集戴氏一身的考據、詞章學養共同運作的結果。即便戴震並未積極申述後者，只消瀏覽《屈原賦注》，我們不是很容易找到這兩種學力相互輔濟的事例嗎！像是：戴注嘗就〈九歌〉牽涉的祀典進行簡明考察，好申辯諸賦乃屈子權藉諸祀典情狀，來鋪寫若「昭誠敬」（指〈東皇太一〉）、「懷憂思」（指〈雲中君〉）、「致怨慕」（指二〈湘〉）、「正於天」（指二〈司命〉），或者寄寓「報秦之心」（指〈東君〉）、假從遊鬼神以自傷悼（指〈河伯〉及〈山鬼〉），還有「閔戰爭之不已」（指〈國殤〉）和「恐常祀之或絕」（指〈禮魂〉）等形色情懷歟。⁹⁵此外，戴注亦嘗透過字句線索，對照屈子生

⁹⁵ 〔清〕戴震：《屈原賦注》，頁 631。案對〈九歌〉涉及的祀典進行考察，歷來注疏皆嘗為之，俱見《楚辭補注》、《楚辭集注》。戴震承續此舉，乃為申述諸篇多為就祀典來數寫情志者，若：〈東皇太一〉乃就「自戰國時奉為祈福神，其祀最隆」的太一祀典，來昭明屈子的誠敬之志；〈雲中君〉亦就「殆戰國時有增入祀典者」的雲師祀典，來宣洩對君王的憂思；又侍奉舜二妃「以為湘水神，本民間不經之說。二妃固不隨愚民俗議，而享其褻越之祭矣」，故二〈湘〉乃屈子「託意於神既不來，巫猶竭誠盡忠思之，用翰寫其事君之幽思如是也」；大司命「主壽夭」，少司命「主災祥」，斯二神「雖在祀典，然二歌皆非祭辭」，乃屈子「託於與司命離合為辭」，追寫那「懷王初甚任」之，「後乃以讒疏絀之」的際遇；〈東君〉「蓋舉迎日典禮賦之」，以伸張屈子那「頃襄之當復讎，而不可安於聲色之娛也」的主張；又《春秋傳》明證「楚人不（按：越境）祭（按：黃）河」，〈河伯〉「歌辭但言相與遊而已」，屈子蓋為透露他「投汨羅之意已決」；〈山鬼〉「通篇皆為山鬼與己相親之辭，亦可以假山鬼自喻」，無非屈子用來「自弔其與山鬼為伍」，或「自悲其同乎山鬼也」的愁苦；最後，〈國殤〉、〈禮魂〉皆「直賦其事」，用來表達他「閔戰爭之不已」和「恐常祀之或絕」的忡忡憂心（分見〔清〕戴震：《屈原賦注》，頁 632、633、635、638-639、641、642、643、644）。總之，戴震以為：「巫所常歌，不應有通篇言神

平及放逐路線，好準確詮釋〈九章〉諸文的意思：案戴震以為「〈九章〉不作於一時」，若〈抽思〉、〈思美人〉宜為屈子初放漢北時所作，而由〈哀郢〉、〈惜往日〉到〈懷沙〉，愁思加重卻無能解銷的屈子，遂抱著對母國頹危欲墜情勢的忡忡憂心，逐步踏上了自沉之路云云。⁹⁶此等例子告訴我們：除卻世人熟知的經史學養外，戴震注騷確實大力施展著他亦擅長的詞章學力。且正是出自兩種能力的分陳和相互輔濟，才教他自信完成了尤能發掘《屈賦》真意、屈子真心的注疏，也就是《屈原賦注》該書。⁹⁷

五、《屈原賦注》的學術史意義

行文至此，我們已對《屈原賦注》的特色和成績做過一番討論。在本節，我們將從學術史角度闡發該著作的幾點意義。

不來者；屈子自祭，不應有通篇言往遊，不及祭之一語者。《魯論》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清〕戴震：《屈原賦注初稿》，頁564）故〈九歌〉乃屈子權藉諸祀典情狀，來鋪寫其形色憂愁和冀望者。

⁹⁶ 案此等考察，戴震屢屢採用方矩之言。若：按「鳥自南來集」、「望南山而流涕」、「南指月與列星」和「狂顧南行」諸句，判定〈抽思〉乃屈子（於懷王時）始放漢北所作；據「觀南人之變態」、「獨煢煢而南行兮」，推測〈思美人〉「宜為在漢北所言」；依「森南度之焉如」、「今九年而不復」，言〈哀郢〉「蓋頃襄遷之江南，及是九年也」之作；就「乘騏驎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汜淪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該章，謂「此蓋有見頃襄之行事而云然」，故〈惜往日〉乃居江南時的憂國賦篇；又釋〈懷沙〉「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莫。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該章，繫連「〈涉江〉篇由沅入澗乃至遷所」路線，解說赴汨羅自沉，屈子確嘗北行之意。分見〔清〕戴震：《屈原賦注》，頁672、675、669、678、673。另戴震嘗據《史記》申言屈子的家國憂思。像解讀〈哀郢〉「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即對照〈楚世家〉謂：「夏屋為墟，兩東門蕪塞，蓋有見於頃襄所為而云。《史記》：頃襄元年，秦攻楚，取析十五城。十九年，楚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攻西陵。二十一年，秦遂拔郢，燒先王墓夷陵。楚東北保於陳城。屈原〈哀郢〉所慮及者遠矣。」（〔清〕戴震：《音義》，頁782）；在解說〈惜往日〉「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離君之不識」該章，亦引述顧炎武（1613-1682）之言：「懷王以不聽屈原而召秦禍，今頃襄王復聽上官大夫之譖而遷之江南，一身不足惜，其如社稷何？《史記》（按：〈屈原賈生列傳〉）所云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即原所謂『禍殃之有再』也。」（〔清〕戴震：《屈原賦注》，頁678）

⁹⁷ 案盧文弨謂戴注「屈子辭無有不醇者」該講法，其見識遠勝過班固（32-92）、顏之推（531-591）和劉勰（465?-520）等對屈原斯人斯賦作的負評，像是露才揚己，不懂明哲保身，輕言怨懟君王，出辭時或荒誕云云。詳見〔清〕盧文弨：〈屈原賦注序〉，頁245。看來戴震考據、詞章學養的交相發揮，真讓盧氏接受了他的判斷。又王大年亦嘗討論戴注的鑑文睹心功夫。詳見王大年：〈戴震的屈賦研究〉，《雲夢學刊》1995年第4期，頁15、56。

首先我們注意到，戴震注騷尤倚重詞章學素養，其實這正呼應時《楚辭》學的發展趨勢。案伴隨古文詞章學的盛行，凡具範文價值的文章每能吸引文評家的目光。前文提及的《孟子》和〈檀弓〉即是顯著例子，作為騷賦開山祖的《屈賦》自然不能例外。總之，明清時期的《楚辭》注疏紛紛走上詞章品評一途，標榜詳究文術好闡發騷人情志的論著俯拾可見。於是嘗具典範地位的，那朱熹力主的援《詩》六義來注騷的方式，⁹⁸遂因功效不彰或難以貫徹等理由遭致檢討和批判。若：「朱子集註之時，亦畧發其義理之趣，而詳審其比興之體，無暇論其文章之妙」，或者：注騷若「泥定」賦、比、興一類標注，恐會造成「意枯而語滯矣」的負面效果，或者：此等「賦、比、興註腳」實「亦屬繁雜可厭」云云！⁹⁹相對下，注騷尤須仰仗詞章學力的主張卻不絕於耳。說的較詳實地像是「余所紬繹，槩屬屈子深旨，與其作法之所在，從來埋沒未抉，特為創拈焉。凡複字複句，或以後翻前，或以後應前。旨、法所關，尤倍致意」云云，講的較精簡地有「惟是依文擇義，使學者章句分明以進窺其大旨之所在」、或「希達屈子之情於意言相屬之際」云云。¹⁰⁰此外，為期精確掌握騷人心緒遂進行的史地考述工作，像是對照傳記、製作譜牒，甚至繪製屈子的行蹤路線圖等等，也成為注家的共同行動。¹⁰¹舉凡此等現象，不也或多或少反映在《屈原賦注》

⁹⁸ 案所謂援六義注騷，源出朱子判定《楚辭》深受《詩經》影響，故他力主要從樂調（指風、雅、頌）和筆法（指賦、比、興）二面向來體味、闡發騷賦意旨，遂於《楚辭集注》實踐其主張，並在《楚辭》學史上發生影響。詳見陳志信：〈從理學修為面向論朱熹的《楚辭集注》〉，《政大中文學報》第24期（2015年12月），頁211-231。

⁹⁹ 分見〔明〕汪瑗：《楚辭集解》，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冊，頁205；〔明〕陸時庸：〈楚辭條例（之六）〉，收於〔明〕陸時庸：《楚辭疏》，收於吳平、回達強主編：《楚辭文獻集成》第6冊（揚州：廣陵書社，2008年），頁4114；〔清〕林雲銘：〈凡例（之五）〉，頁4。可補充的是，嘉靖年間的汪瑗乃歸有光高徒，他注騷尤重發明詞章學力。《楚辭集解》甫完稿，他還執書就教歸氏，得到確能洞察文心的稱讚。詳見趙靜：〈汪瑗的生平及著述〉，《圖書館學研究》2016年第9期，頁98-99、101。

¹⁰⁰ 分見〔明〕黃文煥：〈凡例（之四）〉，收於〔明〕黃文煥：《楚辭聽直》，收於吳平、回達強主編：《楚辭文獻集成》第7冊，頁4561；〔清〕錢澄之：〈莊屈合詁自序〉，收於〔清〕錢澄之：《莊屈合詁》（合肥：黃山書社，1998年），頁4；〔清〕王夫之：〈序例〉，收於〔清〕王夫之：《楚辭通釋》，收於〔清〕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船山全書》第14冊（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頁207。

¹⁰¹ 若林雲銘《楚辭燈》冠以〈屈原列傳〉、〈楚懷襄二王在位事蹟考〉者。另康熙年間的蔣驥，其《山帶閣註楚辭》首列〈屈原列傳〉、沈亞之（781-832）〈屈原外傳〉、〈楚世家節

裡面，且細考內容，我們還會發現戴震接收了不少前輩的成果哩！¹⁰²是以戴氏注騷實未嘗自外該時《楚辭》學潮流，這是我們必須談的第一個要點。

再者，綜覽戴震諸多學術論著，我們不難發現，詞章、考核學力的分陳和相輔濟蓋他治學的一貫策略。以《詩經》學為例，戴震在注騷同時，也將觸角伸向了《三百篇》，其《毛詩補傳》完成在初次坐館汪家後期。對這部著作，戴震一方面頗滿意他對諸詩（特別是〈變風〉）所作的詞章評析，自信發明了詩人那「用心獨苦」、「立言最難」的地方，另一方面他又屢就音韻、名物等學識精闢闡釋詩意。¹⁰³若說詞章學的發揮，乃注家深受從前文化影響所致，那麼考據學的施展，就是學者意識到爾今治學須倚重另套功夫了。是以並陳《屈原賦注》的兩種學養，恰恰反映出新儒學運動發展至此的轉折變化，這是我們要談的另個重點。打鐵趁熱，在論文結束前，且讓我們援此注騷事例獲得的，那戴震身處古文詞章學潮流中，卻又積極援用考核學力的印象，對他的論文、述學文獻進行一番梳理，好究明這位鉅儒的學問主張。

覽讀戴震留下的豐富文件，尤其是因論文遂暢談治學之道者，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他對新儒學運動的熟稔程度：他非但對諸前輩的論述相當熟悉，甚至能熟練操作彼者的講說套式及措辭。像在〈與方希原書〉中，戴震向方「大肆力古文之學」的學友方矩，切磋所謂的習文正途：亦即須

略)及〈考正地圖〉(計〈楚辭地理總圖〉、〈抽思思美人路圖〉、〈哀郢路圖〉、〈涉江路圖〉、〈漁父懷沙路圖〉五幅)。四庫館臣嘗言：蔣氏「考原事迹之本末」、「考原涉歷之後先」，其「所注即據事迹之年月、道里之遠近，以定所作之時地」，連番舉措「雖穿鑿附會，所不能無；而徵實之談，終勝懸斷」。詳見〔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4冊，頁3817。可見該時治《楚辭》的考述風氣。

¹⁰² 像黃建榮就指出戴震解「康娛」句式，實承自汪瑗《楚辭集解》。詳見黃建榮：〈戴震《屈原賦注》的字詞注釋特色〉，頁59。又方燾如亦嘗注騷。戴震對〈離騷〉章法的析論，若上半篇反覆申言好脩、設言或將隱退，還有下半篇上天、求女，及與靈氛、巫咸對答終而遠逝云云，很可能受其師的啟發。分見〔清〕方燾如：《離騷經解略》，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冊，頁261-263。

¹⁰³ 案段玉裁謂《毛詩補傳》成書於乾隆18年(1753)，楊應芹判斷在15年或稍前，該書已初成。詳見楊應芹：〈段著東原年譜訂補〉，頁143-144。又「用心獨苦」、「立言最難」云云，語出〈毛詩補傳序〉，戴震謂諸變詩多為「大忠而託之詭言遜辭」者，故尤須費心揣摩詩人的情志何在。詳見〔清〕戴震：《毛詩補傳》，收於〔清〕戴震撰，楊應芹、諸偉奇主編：《戴震全書》第2冊，頁128。有關戴震注《詩》考核、詞章學分陳且時而並濟的情況，詳見陳志信：〈論戴震「觸事廣類」的研《詩》方法〉，頁121-123、125-128。

具備《六經》根柢，待「義理」、「制數」均了然於胸、「大本」業已紮穩，吾人自能沛然吐辭云云。且看這講法，不正從「養其根而竦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這韓愈〈答李翊書〉的名句化出的嗎？¹⁰⁴又對科舉該事，縱使面對時人多「苟焉皮傳，剿說雷同，學不一二年，目不睹全經，掇拾巍科高第，不必素所蓄積也」該流弊，他還是對經義取士抱持正面態度：既謂科舉本欲教士子「通經」且「純粹其材識」，好培育出任官的才幹與德行，若「可俾之化理斯民，克敬其事，供其職」云云；又謂從前虞、夏、商、周盛世固能讓「士升以德」，然世事既已變遷，後代遂「不能不以言取（按：士）」、好就文章來「徐覘其德」也。¹⁰⁵此番見解除展現他務實的態度，不也顯示他對諸先輩介入科考時，那崇經典、倡儒術的初衷，還有鑑文知德的設計全盤明瞭嗎！再者，對時文寫作課題，戴震也有圓熟的表述，像是〈與某書〉的這段文字：

足下制義，直造古人，冠絕一時。夫文無今古之異。聞道之君子，其見于言也，皆足以羽翼經傳，此存乎識趣者也。而辭不純樸高古亦不貴，此存乎行文之氣體格律者也。因題成文，如造化之生物，官骸畢具，根葉並茂，少缺則非完物，此存乎冶鑄之法者也。¹⁰⁶

案文章無須區分古文、時文，一切惟取決「聞道之君子」能否立言來闡發先聖遺經耳，這說法豈非中唐以降諸文家的核心主張！另行文當下須圓熟

¹⁰⁴ 案戴震該文謂司馬遷（西元前 145-86）、班固、韓愈、柳宗元諸君均明瞭「根固者枝茂」該道理，遂「不廢浸灌之資，雨露之潤」，力圖教「學問功深而不已於其道也」，無怪諸先輩文章「朝露不足以榮瘁之」，絕不同徒攻文章之流般「得朝露而榮，失朝露而瘁，其為榮不久」。接著話鋒一轉，戴氏謂方矩「更有所謂大本」，亦即須致力經學，好教文章臻至「以聖人之道被乎文，猶造化之終始萬物也」的至境。要之，此等藉植物為譬的論述當取法〈答李翊書〉。詳見〔清〕戴震：《東原文集》，頁 372-374。「養其根而竦其實」云云，詳見〔唐〕韓愈：《韓昌黎先生集校注》，頁 169。另戴文嘗以風景為譬，謂諸文章前輩「之為道也，譬猶仰觀泰山，知羣山之卑；臨視北海，知眾流之小」。若方氏專致研經，遂將「履泰山之巔，跨北海之涯」，得見「天地間之鉅觀」（〔清〕戴震：《東原文集》，頁 373-374）。這譬喻同樣是先輩的路數。若黃庭堅談文章至境時，嘗謂：「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簡陋也。」詳見〔宋〕黃庭堅：〈答洪駒父書三首〉，頁 203-204。

¹⁰⁵ 分見〔清〕戴震：〈輯五王先生墓誌銘〉、〈鳳儀書院碑〉，收於〔清〕戴震：《東原文集》，頁 431、401。

¹⁰⁶ 詳見〔清〕戴震：《戴東原先生文》，頁 478。

運作「氣體格律」（所謂「氣體格律」，除指八股文體式，蓋亦包涵自範文習得的文術，及涵養出的渾厚氣質、後將發為文氣者），好將融會吾人胸次的見識（即所謂「識趣」）淋漓闡釋出云云，不也是從前承古文運動精神談時文者的主要論述！還有，引文謂好的時文每能「因題成文」，將若「造化之生物」般達到「官骸畢具，根葉並茂」的境界。此番「冶鑄之法」的描繪，不也屢見曩昔新儒學運動成員的措辭中！¹⁰⁷凡此種種，無不說明戴震論學確與古文詞章學密切相干。

既然戴震所言每每承自前人論述，那為何自治學伊始，他卻極度倚賴像是文字、聲音和訓詁等研經考核之學？不但極力申述此乃通經求道的要津，且透過系列著作實踐自己的主張，甚至對《屈原賦注》該大肆發揮詞章學力的論著，他還是一味申言考據是何等重要云云。這看來不甚合理的情況，究竟該怎麼解釋呢？我們認為答案應該是：戴氏雖援取諸多詞章學資源，但基於發現某個嚴重問題，遂對治學之道別有一番思量與改造，而他對考據學的強調就是從這兒發端的。

案自古文運動強調學文養氣，冀望從聖賢之言涵養出自家的智識、氣象以來，就先哲遺文反覆諷誦，好悉心領會其中的意蘊、精髓云云，便成了古文家、理學家明道修德的主要途徑。又古文詞章學的主張與技術，若就章法、開闔關鍵、文脈及辭氣來體味文家的心緒情思云云，也是同個文化的產物。回顧前文的歷史考述，我們不就看到學文養氣以期吐辭垂文該主張，是同見古文和理學陣營的。且詞章評析從來就不僅僅是為了鑑賞，它同時也是探究義理的重要手段。平心而論，昔人謂「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志」須待「言」和「文」的摛藻組織之功方得完備、完美表述，殆為古人的共通看法，那麼為了逆溯為文、立言者之「志」究竟如何，遂於「言」、「文」處下足功夫，便是理所當然的事了。¹⁰⁸惟若單單憑藉這點來

¹⁰⁷ 古文、時文無須區隔這點，茅坤〈復王進士書〉已言。又吾人須專務經術，且在範文指引下寫出承繼儒道的時文這點，茅坤〈文訣五條訓縉兒輩〉、孫慎行〈荊翁時義集序〉皆有發揮，方苞《欽定四書文》揭櫫的「理」、「辭」、「氣」兼顧說（〈凡例（其二）〉）亦然。另所謂「冶鑄之法」，方苞有類似說法，若他嘗謂唐宋派大家時文「以古文為時文，融液經史，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云云（〈凡例（其一）〉）。再者，「如造化之生物，官骸畢具，根葉並茂」云云，朱熹在陳說文章至境時，早有類似講法，若：「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詳見〔宋〕黎靖德編，鄭明等校點：《朱子語類（五）》，頁4314。

¹⁰⁸ 案「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語出《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孔子（西元前551-479）引古

闡述聖賢微旨，就不免會發生自由心證、自圓其說等問題，這就是戴震常對宋學提出的批評，亦即所謂的「鑿空」或「空憑胸臆」。

何謂「鑿空」？何謂「空憑胸臆」？戴震指控的，正是新儒學運動帶起的，那偏就詞章面理解聖人遺訓、體察先哲旨意，卻沒有堅實的語文知識，還有專家學問、文獻證據來支持的治學方式。那戴震會在什麼狀況做這種批判？除卻適逢紀念漢學宗師惠棟（1697-1758）的場合，或應考據學人邀約，須為彼等論著題序、書齋記文，正可撰寫像是〈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古經解鉤沉序〉和〈鄭學齋記〉一類文章，好申辯吾輩學問確有根據，絕非憑恃體會的宋學能及外，¹⁰⁹還有的時候，他是針對當時仍就宋學來治學的人發言的，像〈與某書〉、〈答彭進士允初書〉就是這類文獻。職是在前封書信，戴震遂對時文頗有水準的「某」，娓娓陳說作經義的根本尚在研經，且須仰仗訓詁方得精通經典的道理；在後封信件，他更不假辭色地指正彭紹升（1740-1796）的經義，正犯了「空憑胸臆」、遂「以己之見硬坐為古賢聖立言之意」的通病：表面看來，彭氏所呈時文集《二林居制義》非但「文境高絕」，闡釋道理亦能「大暢心宗，參活程、朱之說，以傳合《六經》、孔、孟，使閱肆無涯涘」；然正緣欠缺了研經考核一段功夫，其言實不過是將私心所向的「老、莊、佛、陸（按：象山）、王（按：陽明）之道」，來附會「《六經》、孔、孟、程、朱之言」的巧言或偽論罷了。¹¹⁰要之，蓋因戴震深切了解到宋學總易流於誤植聖道的弊病（還有那會引起的紛擾和災難），他才會叮嚀這、指教那的，對時下學人做出這些不已的教誨。¹¹¹

書來稱讚子產（西元前?-522）的外交辭令。詳見〔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收於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32冊，頁1176。

¹⁰⁹ 分見〔清〕戴震：《戴氏雜錄》、《東原文集》，收於〔清〕戴震撰，楊應芹、諸偉奇主編：《戴震全書》第6冊，頁497-498；頁375-376、404-405。案〈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乃乾隆30年（1765）戴震過訪蘇州拜觀惠棟畫像所作。余蕭客（1732-1778）身為惠棟弟子，嘗戮力蒐羅唐以前經說完成《古經解鉤沉》一書，戴氏為之作序。又王昶為申揚漢學，遂命其校書之室曰「鄭（按：玄）學齋」，亦屬託戴氏作記。在這些文章中，戴震即以「空憑胸臆」、「鑿空得之」或「競相鑿空」等措辭批判宋學。相對說，他認為吾輩既與聖賢時代懸遠，遂不得不透過訓詁途徑治經求道。

¹¹⁰ 分見〔清〕戴震：《戴東原先生文》、《東原文集》，頁478-479；頁350、359-360。案「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為古賢聖立言之意」云云，語出〈與某書〉（〔清〕戴震：《戴東原先生文》，頁478），這話正可用來指正《二林居制義》。

¹¹¹ 案在〈與某書〉、〈答彭進士允初書〉，還有〈第九札〉等書信，戴震都對宋儒誤以佛、老

如果說在體道明道的路上，彭紹升等的法子不足恃憑，那適足仰賴的就該是研經考核之道了。且看戴震嘗寫信給盧文弨，引薦好友程瑤田。對這位相知甚久的學友，戴氏獨對其學問的轉變，亦即從「少功詞章之學，詩、古文詞皆有法度」，到「年來有志治經，所得甚多」云云深表讚許。該信又云「其讀書沉思覈定，比類推緘，震遜其密」，這當然是稱讚程氏治經確能發揮參覈之功了。¹¹²舉凡此等舉揚，蓋亦在表述戴氏自家的治學主張。總之，在戴震看來，為學求道總須具備考據根柢，也就是須有語文知識、專家學識的支撐，還有相干文獻的佐證。若能如是踏實治經，一路「由六書、九數、制度、名物」來「通乎其詞」，戴震認為吾人必能克服時空阻隔、探知先聖的立言之心。這除卻能糾正「空憑胸臆」、遂「以己之見硬坐為古賢聖立言之意」的流弊外，更因通曉了往聖先賢的製作大義，遂將復明吾心本具的、那能「全天德，制百行」的智識和胸懷。¹¹³如是一來，若有幸逢遇明主，吾人將一展經世長才造福世人；若無緣施展抱負，吾輩或者注經、或者垂文，亦能讓儒道傳習不絕，此生將了無遺憾歟。¹¹⁴

「無欲」之說說「理」的課題，進行嚴正批判。他認為：宋儒逕以無欲說理，遂未能深究聖王體恤民欲的禮樂製作用心。且士大夫惟憑己見治民，遂造成以理殺人的災難。分見〔清〕戴震：《戴東原先生文》、《東原文集》、《與段茂堂等十一札》，頁 478-479、356-357、531-532。

¹¹² 詳見〔清〕戴震：〈再與盧侍講書〉，收於〔清〕戴震：《東原文集》，頁 290-291。

¹¹³ 詳見〔清〕戴震：〈鄭學齋記〉，收於〔清〕戴震：《東原文集》，頁 405。案戴震認為，經典的價值就在備載聖王通情達理的制度，故研經為的是洞察其製作用心，好恢復吾人本具的智識和胸襟。此即「訓詁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賢人聖人之理義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云云的意思（〔清〕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收於〔清〕戴震：《戴氏雜錄》，頁 498）。

¹¹⁴ 這就是戴震對沈大成（1700-1771）的稱述。案乾隆 25 年，年三十八歲的戴震「在揚州與沈大成同校何焯校本《水經注》，二人一見如故。詳見楊應芹：《段著東原年譜訂補》，頁 151。戴震嘗作文稱述沈氏為學：「於《六經》小學之書，條貫精覈，目接手批，丹黃爛然，而恂恂乎與叔重（按：許慎）、康成（按：鄭玄）、沖遠（按：孔穎達）諸人輩行而踵躡也。」對沈氏久居幕僚的際遇，他亦申言：「儒者之學，將以解蔽而已矣。解蔽，斯能盡我生；盡我生，斯欲盡夫義命之不可已；欲盡夫義命之不可已，而不吾慊志也。」時至 49 年（1771），戴震又為文記述沈氏的用功，若：「方炎夏，金石流，草木焦，而先生持經籍一卷，往復校覈，無倦容。然則天地有寒暑，惟用心一者不知之。」稱讚沈氏每能就「小學故訓」通曉聖賢立言之心。至於其文章「繩尺法度」每能「力追古人」，戴震指出此乃研經之功的餘力耳。分見〔清〕戴震：〈沈處士戴笠圖題詠序〉、〈沈學子文集序〉，收於〔清〕戴震：《東原文集》，頁 393-394、391。又在段玉裁眼中，戴震同樣成就了窮則垂文的典型。若他嘗稱頌其師：「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

結束討論前，且讓我們讀讀段玉裁的一段話，是言蓋為戴學的特色和成績做出總結：

先生於性與天道，了然貫澈，故吐辭為經，如《句股割圓記》三篇、《原善》三篇、《釋天》四篇、《法象論》一篇，皆經也。其他文字，皆厚積薄發，純樸高古，如造化之生物，官骸畢具，枝葉並茂。嘗言：「做文章極難，如閻百師極能考核，而不善做文章；顧寧人、汪鈍翁文章較好。吾如大爐然，金銀銅錫入吾爐一鑄，而皆精良矣。」蓋先生合義理、考核、文章為一事，知無所蔽，行無少私，浩氣同盛於孟子，精義上駕乎康成、程、朱，修辭俯視乎韓、歐焉。¹¹⁵

乍讀下，這段引文令人印象最深的，是段氏對其師學養，還有解經、行文無不臻至至境的稱頌，亦即「蓋先生合義理、考核、文章為一事，知無所蔽，行無少私，浩氣同盛於孟子，精義上駕乎康成、程、朱，修辭俯視乎韓、歐焉」云云。然該文更值得留意的地方，其實在他是就考據、詞章二面來評說戴學成就的：亦即戴氏兼擅二者，其論著、文章俱能昭示義理。為何在世人對戴學以考核見長的印象外，段玉裁要費詞申述其師的詞章功力，甚至要引述戴震對閻若璩（1636-1704）偏擅考據，不及顧炎武、汪琬（1624-1691）亦長於作文該評語，來驗證其師態度確在兼擅二者？我們認為蓋因他對戴震在詞章學投注的心血甚為了解，且可能意識到其師對研經考核之功的強調，源自對該時仍盛行的，那承自新儒學運動的學文養氣、修道垂文論述的修正。故在評述戴學時，除要申揚老師遠邁前輩的考核業績，亦須申言其詞章成績未遜諸大家耳。總之，在戴震的調整框架下，只要吾輩能通過考據探得精確義理，待「大本」紮穩，吾人自能吐辭垂訓、傳衍聖道。至於所垂者為何？套他的話說：「吾如大爐然，金銀銅錫入吾爐一鑄，而皆精良矣。」是以或為考核論著，或為形色詞章，將無一不是融釋至道而足彰明義理的力作。¹¹⁶

弊。」故段氏晚年每將《原善》、《孟子字義疏證》同諸經典「恭安几上，手批口讀」，好進行自訓詁名物制度考見民情物理的功課。分見〔清〕段玉裁：〈戴東原集序〉、〈十經齋記〉，收於〔清〕段玉裁：《經韻樓集·經韻樓文集補編》，頁370、237。

¹¹⁵ 〔清〕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頁182。

¹¹⁶ 可補充的是，任兆麟（?-1796）嘗謂戴震時文「識趣」、「體格」俱善，又謂「言性諸篇，

最後值得一提的，戴震論學、治學既與詞章學風息息相關，嘗與青年戴震相砥礪，同受江永、方燾如教誨的學友，像是鄭牧、汪肇瀧、汪梧鳳、程瑤田、方矩和金榜諸君，後來更與劉大櫟產生深刻情誼，彼此切磋文章，甚是勤快。¹¹⁷凡此種種，無不透露在關懷詞章修習的基礎上，徽州、桐城間的學問是頗有交集的。故關於該時代義理、詞章與考核的錯綜關係，或有待更細緻的討論。¹¹⁸

六、結論

戴震研討經典，始自考察文字、聲音的淵源演化，且務與名物制度、經傳注疏相參覈，故每能洞曉微旨、發明義理。此等學力於其青壯年著作，像是《屈原賦注》已能純熟展現。然而是注亦有評析，來縝密討論文章的開闔關鍵及段落旨趣，其《初稿》尚有眉批，來標明、闡發《屈賦》反覆迂曲的辭氣變化，評、批間淋漓體現詞章家獨有的精神和才情。而考核、文章學養並陳其中的現象，促成本文的誕生，引起我們關注下列課題，若：戴震的詞章學來歷為何？他評析、批注《屈賦》的行動，繫屬何種文化活動？該活動的目的、方法及效果為何？還有戴震的《楚辭》詮釋，在兩種學力的運作下取得何等成就？又該著作對理解戴氏的治學特色，甚至是該時學風將有何啟示？

細察戴震學歷，我們發現自徽州治學伊始，他即擅用考核手段來通曉聖道。其鄉前輩，同時是考據學先聲江永的提攜與鼓勵固為世人所樂道，

與所著《原善》相表裡」。接著感歎：「近世考古家，於時藝多不屑為，或為之不工，工矣又不盡傳……。」詳見〔清〕任兆麟：〈戴東原制義敘〉，收於〔清〕戴震撰，楊應芹、諸偉奇主編：《戴震全書》第7冊，頁315。可見戴震確能就包括時文在內的形色文字來闡述儒道。且較諸考據學人，他的詞章表現更顯突出。

¹¹⁷ 案馮峰嘗言：方燾如為戴震諸學友種下了詞章種子，諸君後與任黟縣教諭多年的劉大櫟相從甚密。詳見馮峰：〈桐城派與徽州樸學〉，《安徽史學》2012年第5期，頁87-88。另劉氏和姚鼐（1731-1815）都透過主講書院因緣傳播桐城義法，遂促成桐城、徽州學風的交流。分見江小角、王佳佳：〈劉大櫟對清代徽州教育的貢獻及影響〉，《安徽史學》2014年第3期，頁128-133；江小角、朱楊：〈姚鼐主講安徽書院述略〉，《合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6期（2012年11月），頁50-55。

¹¹⁸ 案桐城健將也對考據學產生興趣。像姚鼐嘗閱覽戴震成名作《考功記圖》，且勸無須過早刊行。戴氏遂暢言其治學之嚴謹，若「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云云，好為姚氏釋疑。詳見〔清〕戴震：〈與姚孝廉姬傳書〉，收於〔清〕戴震：《東原文集》，頁370。

然以古文、時文享有盛名的方燦如，亦因講學紫陽書院因緣，對為應科考而勤修詞章的戴氏產生了一定影響。且不論實作或賞析，戴震都有出色的表現。再從文化面考察，主因古文運動和理學的先後介入，宋元以降取士遂倚重策論和經義，標榜觀文來鑑別才識和德行。仕途通塞與否既取決於文章表現，詞章學的講論便成為不可逆的趨勢。為了示範行文技藝，諸評家及文派紛紛纂輯範文且施以詳密評析，取法大家文來提煉實作水準的主張成為文壇共識。值得注意的是，詞章學固須保障應試能力，然為評說大家吐辭之妙，諸評者於講授文法之際，每每費詞揣度、推說文家的立意用心，種種往返文心及篇章間的析論和闡釋，既確定了古文詞章學的基本形態，也將新儒學運動學文養氣、修德垂文的理念傳承下去。而戴震評、批《屈賦》的舉措，正是就該學套路進行的典型行動。

反映在《屈原賦注》（含《初稿》）上，我們看到戴震時就立意、文術進行概說，時就段落、章節的起訖開闢，敘述的斷續線索、辭氣的抑揚轉折，或者造句、煉字諸面向層層解說，以期朗現《屈賦》抒情述志的形色手法。較突出的像是：〈天問〉的遇事詰難、聊舒憤懣而不以類次，〈九歌〉的就諸祀典作賦以表諸情志（若：昭誠敬、懷憂思、致怨慕、正於天、寄寓報秦之心、假神鬼以自傷自悼、閱戰爭之不已、恐常祀之或絕云云），還有〈離騷〉的反覆申言其好脩不渝之志，託言將遠遊自疏以祈求慰藉等等。透過這些解說，戴震遂得逆體屈原既未嘗怨懟君王、抑不忍輕言絕君的心緒，從而證明遵奉古來聖賢治道，時時懸念匡輔君主的屈子的忠貞志節。這就行文面逆溯並體味作者起伏情志的詞章學養，配合精煉的考核學力，終讓他自信完成了尤能凸顯屈子之學、志及立言指要無不至純的論著，從而訂正、洗刷之前《楚辭》注解對斯人斯言的謬解與汗巖。

綜覽明清《楚辭》學的發展，我們發現側重詞章品評、時或輔以考證的情況很普遍，故《屈原賦注》實和同時代注騷潮流相呼應。再觀察戴震的學術生涯，我們發現考據學、詞章學的分陳與相輔濟，乃他治學的根本策略。像同期著作《毛詩補傳》的研治手段即與《屈原賦注》如出一轍。最後，將戴震的論學文獻統理一番，我們更能看出他對古文運動以來誦文養心、吐辭成經主張的繼承，惟須仰仗考核研經之功來保障知見的正確性，戴氏認為吾人必可復現聖賢情志，復明自家洞曉世事情理的心智和胸次，從而進能經世濟民，退能垂文萬代。無怪其高足段玉裁宣稱「蓋先生合義理、考核、文章為一事」耳。還值得觀察的是，與青年戴震相砥礪，同受

江、方二師教誨的眾學友，後與劉大櫨產生了真切情誼。此番因緣，透露徽州、桐城學風存有融通契機，考核與詞章確有交集處，這現象或將引發更細緻的學術史議題。

【責任編校：李珍瑋、黃佳雯】

徵引文獻

專著

- 〔周〕左丘明 Zuo Qiuming 傳，〔晉〕杜預 Du Yu 注，〔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春秋左傳正義》*Chunqiu zuozhuan zhengyi*，收入李學勤 Li Xueqin 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Shisanjing zhushu zhengliben* 第 32 冊，臺北 Taipei：臺灣古籍出版社 Taiwan guji chubanshe，2001 年。
- 〔漢〕毛亨 Mao Heng 傳，〔漢〕鄭玄 Zheng Xuan 箋，〔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毛詩正義》*Maoshi zhengyi*，收入李學勤 Li Xueqin 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Shisanjing zhushu zhengliben* 第 5 冊，臺北 Taipei：臺灣古籍出版社 Taiwan guji chubanshe，2001 年。
- 〔漢〕班固 Ban Gu 撰，〔唐〕顏師古 Yan Shigu 注：《漢書》*Hanshu* 第 6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2 年。
- 〔漢〕趙岐 Zhao Qi 注，〔宋〕孫奭 Sun Shi 疏：《孟子注疏》*Mengzi zhushu*，收入李學勤 Li Xueqin 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Shisanjing zhushu zhengliben* 第 45 冊，臺北 Taipei：臺灣古籍出版社 Taiwan guji chubanshe，2001 年。
- 〔唐〕韓愈 Han Yu：《韓昌黎先生集校注》*Han Changli xiansheng ji jiaozhu*，上海：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7 年。
- 〔宋〕王正德 Wang Zhengde：《餘師錄》*Yushi lu*，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集部第 419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6 年。
- 〔宋〕朱熹 Zhu Xi：《楚辭集注》*Chuci jizhu*，收入朱傑人 Zhu Jieren、嚴佐之 Yan Zuozhi、劉永翔 Liu Yongxiang 主編：《朱子全書》*Zhuzi quanshu* 第 19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合肥 Hefei：安徽教育出版社 Anhui jiaoyu chubanshe，2002 年。

- 〔宋〕朱熹 Zhu Xi 撰，徐德明 Xu Deming、王鐵 Wang Tie 校點：《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Huian xiansheng Zhuwengong wenji (4)*，收入朱傑人 Zhu Jieren、嚴佐之 Yan Zuozhi、劉永翔 Liu Yongxiang 主編：《朱子全書》*Zhuzi quanshu* 第23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合肥 Hefei：安徽教育出版社 Anhui jiaoyu chubanshe，2002年。
- 〔宋〕洪興祖 Hong Xingzu：《楚辭補注》*Chuci bu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3年。
- 〔宋〕黃庭堅 Huang Tingjian：《豫章黃先生文集》*Yuzhang Huang xiansheng wenji*，收入王雲五 Wang Yunwu 主編：《四部叢刊正編》*Sibu congkan zhengbian* 第49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79年。
- 〔宋〕黎靖德 Li Jingde 編，鄭明 Zheng Ming 等校點：《朱子語類（五）》*Zhuzi yulei (5)*，收入朱傑人 Zhu Jieren、嚴佐之 Yan Zuozhi、劉永翔 Liu Yongxiang 主編：《朱子全書》*Zhuzi quanshu* 第18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合肥 Hefei：安徽教育出版社 Anhui jiaoyu chubanshe，2002年。
- 〔宋〕蘇洵 Su Xun：《嘉祐集箋註》*Jiayou ji jian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3年。
- 〔元〕完顏納丹 Wanyan Nadan 等撰：《通制條格校注》*Tongzhi tiaoge jiao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1年。
- 〔元〕脫脫 Tuo Tuo 等撰：《宋史》*Songshi* 第11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7年。
- 〔明〕艾南英 Ai Nanying：《天慵子集》*Tianyongzi ji*，清光緒5年重刊梯雲書屋本。
- 〔明〕汪瑗 Wang Yuan：《楚辭集解》*Chuci jijie*，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集部第1冊，臺南 Tainan：莊嚴文化 Zhuangyan wenhua，1997年。
- 〔明〕茅坤 Mao Kun：《玉芝山房稿》*Yuzhishanfang gao*，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集部第105冊，臺南 Tainan：莊嚴文化 Zhuangyan wenhua，1997年。

- 〔明〕茅坤 Mao Kun：《茅鹿門先生文集》*Mao Lumen xiansheng wenji*，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xiu siku quan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第 1344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2 年。
- 〔明〕唐順之 Tang Shunzhi：《文編》*Wenbian*，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集部第 316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6 年。
- 〔明〕孫慎行 Sun Shenxing：《玄晏齋集五種》*Xuanyanzhai ji wuzhong*，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Siku jinhuishu congkan bianzuan weiyuanhui* 編：《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Siku jinhuishu congkan bubian* 集部第 123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出版社 Beijing chubanshe，2005 年。
- 〔明〕陸時庸 Lu Shiyong：《楚辭疏》*Chuci shu*，收入吳平 Wu Ping、回達強 Hui Daqiang 主編：《楚辭文獻集成》*Chuci wenxian jicheng* 第 6 冊，揚州：Yangzhou：廣陵書社 Guangling shushe，2008 年。
- 〔明〕黃文煥 Huang Wenhuan：《楚辭聽直》*Chuci tingzhi*，收入吳平 Wu Ping、回達強 Hui Daqiang 主編：《楚辭文獻集成》*Chuci wenxian jicheng* 第 7 冊，揚州 Yangzhou：廣陵書社 Guangling shushe，2008 年。
- 〔明〕歸有光 Gui Youguang：《震川先生集》*Zhenchuan xiansheng ji* 上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7 年。
- 〔清〕方苞 Fang Bao：《方望溪先生全集》*Fang Wangxi xiansheng quanji*，收入王雲五 Wang Yunwu 主編：《四部叢刊正編》*Sibu congkan zhengbian* 第 83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79 年。
- ：《欽定四書文》*Qinding sishuwen*，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集部第 390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6 年。
- 〔清〕方榮如 Fang Muru：《離騷經解略》*Lisaojing jielüe*，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集部第 2 冊，臺南 Tainan：莊嚴文化 Zhuangyan wenhua，1997 年。

- 〔清〕王夫之 Wang Fuzhi：《楚辭通釋》*Chuci tongshi*，收入〔清〕王夫之 Wang Fuzhi 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 *Chuanshan quanshu bianji weiyuanhui* 編：《船山全書》*Chuanshan quanshu* 第 14 冊，長沙 Changsha：嶽麓書社 Yuelu shushe，1996 年。
- 〔清〕李富孫 Li Fusun：《鶴徵後錄》*Hezheng houlu*，清同治 11 年漾葭老屋本。
- 〔清〕林雲銘 Lin Yunming 撰，彭丹華 Peng Danhua 點校：《楚辭燈》*Chuci deng*，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12 年。
- 〔清〕段玉裁 Duan Yucan：《經韻樓集》*Jingyunlou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8 年。
- ：《戴東原先生年譜》*Dai Dongyuan xiansheng nianpu*，收入〔清〕戴震 Dai Zhen 撰，楊應芹 Yang Yingqin、諸偉奇 Zhu Weiqi 主編：《戴震全書》*Dai Zhen quanshu* 第 7 冊，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2010 年。
- 〔清〕紀昀 Ji Yun 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Siku quanshu zongmu tiyao* 第 4 冊，石家莊 Shijiazhuang：河北人民出版社 Hebei renmin chubanshe，2000 年。
- 〔清〕孫馮孫 Sun Huosun：《檀弓論文》*Tangong lunwen*，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經部第 102 冊，臺南 Tainan：莊嚴文化 Zhuangyan wenhua，1997 年。
- 〔清〕康濬 Kang Jun：《孟子文說》*Mengzi wen shuo*，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xiu siku quan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第 158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2 年。
- 〔清〕張伯行 Zhang Boxing：《唐宋八大家文鈔》*Tangsong badajia wenchao*，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7 年。
- 〔清〕張廷玉 Zhang Tingyu 等撰：《明史》*Mingshi* 第 5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4 年。
- 〔清〕章學誠 Zhang Xuecheng：《章學誠遺書》*Zhang Xuecheng yishu*，北京 Beijing：文物出版社 Wenwu chubanshe，1985 年。

- 〔清〕程瑤田 Cheng Yaotian 撰，陳冠明 Chen Guanming 等校點：《程瑤田全集》*Cheng Yaotian quanji* 第3冊，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2008年。
- 〔清〕楊廷望 Yang Tingwang 纂修：《浙江省衢州府志》*Zhejiangsheng quzhoufu zhi*，收入成文出版社 Chengwen chubanshe 輯：《中國方志叢書》*Zhongguo fangzhi congshu* 第195冊，臺北 Taipei：成文出版社 Chengwen chubanshe，1989年。
- 〔清〕過珙 Guo Gong：《古文評註》*Guwen pingzhu*，臺中 Taichung：曾文出版社 Zengwen chubanshe，1975年。
- 〔清〕劉大櫚 Liu Dakui：《海峰文集》*Haifeng wenji*，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 Guojia qingshi bianzuan weiyuanhui 編：《清代詩文集彙編》*Qingdai shiwenji huibian* 第286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0年。
- 〔清〕錢澄之 Qian Chengzhi：《莊屈合詁》*Zhuang Qu hegu*，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1998年。
- 〔清〕戴震 Dai Zhen：《毛詩補傳》*Maoshi buzhuang*，收入〔清〕戴震 Dai Zhen 撰，楊應芹 Yang Yingqin、諸偉奇 Zhu Weiqi 主編：《戴震全書》*Dai Zhen quanshu* 第2冊，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2010年。
- ：《屈原賦注》*Qu Yuan fu zhu*，收入〔清〕戴震 Dai Zhen 撰，楊應芹 Yang Yingqin、諸偉奇 Zhu Weiqi 主編：《戴震全書》*Dai Zhen quanshu* 第3冊，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2010年。
- ：《屈原賦注初稿》*Qu Yuan fu zhu chugao*，收入〔清〕戴震 Dai Zhen 撰，楊應芹 Yang Yingqin、諸偉奇 Zhu Weiqi 主編：《戴震全書》*Dai Zhen quanshu* 第3冊，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2010年。
- ：《東原文集》*Dongyuan wenji*，收入〔清〕戴震 Dai Zhen 撰，楊應芹 Yang Yingqin、諸偉奇 Zhu Weiqi 主編：《戴震全書》*Dai Zhen quanshu* 第6冊，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2010年。
- ：《與段茂堂等十一札》*Yu Duan Maotang deng shiyi zha*，收入〔清〕戴震 Dai Zhen 撰，楊應芹 Yang Yingqin、諸偉奇 Zhu Weiqi 主編：《戴震全書》*Dai Zhen quanshu* 第6冊，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2010年。

- 〔清〕戴震 Dai Zhen：《戴氏雜錄》*Daishi zalu*，收入〔清〕戴震 Dai Zhen 撰，楊應芹 Yang Yingqin、諸偉奇 Zhu Weiqi 主編：《戴震全書》*Dai Zhen quanshu* 第 6 冊，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2010 年。
- ：《戴東原先生文》*Dai Dongyuan xiansheng wen*，收入〔清〕戴震 Dai Zhen 撰，楊應芹 Yang Yingqin、諸偉奇 Zhu Weiqi 主編：《戴震全書》*Dai Zhen quanshu* 第 6 冊，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2010 年。
- 〔清〕戴震 Dai Zhen 撰，楊應芹 Yang Yingqin、諸偉奇 Zhu Weiqi 主編：《戴震全書》*Dai Zhen quanshu* 第 3、6、7 冊，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2010 年。

- 陳平原 Chen Pingyuan：《中國散文小說史》*Zhongguo sanwen xiaoshuo shi*，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2004 年。
- 楊應芹 Yang Yingqin：《段著東原年譜訂補》*Duan zhu Dongyuan nianpu dingbu*，收入〔清〕戴震 Dai Zhen 撰，楊應芹 Yang Yingqin、諸偉奇 Zhu Weiqi 主編：《戴震全書》*Dai Zhen quanshu* 第 7 冊，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2010 年。

期刊與專書論文

- 王大年 Wang Danian：〈戴震的屈賦研究〉“Dai Zhen de Qu fu yanjiu”，《雲夢學刊》*Yunmeng xuekan* 1995 年第 4 期。
- 朱迎平 Zhu Yingping：〈宋代科舉試論考述〉“Songdai keju shilun kaoshu”，收入朱迎平 Zhu Yingping：《宋文論稿》*Songwen lungao*，上海 Shanghai：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caijing daxue chubanshe，2003 年。
- ：〈科舉文體的演變和宋代散文的議論化〉“Keju wenti de yanbian han songdai sanwen de yilunhua”，收入朱迎平 Zhu Yingping：《宋文論稿》*Songwen lungao*，上海 Shanghai：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caijing daxue chubanshe，2003 年。
- 朱瑞熙 Zhu Ruixi：〈宋元的時文——八股文的雛形〉“Songyuan de shiwen: baguwen de chuxing”，收入朱瑞熙 Zhu Ruixi：《礪城集》*Liucheng ji*，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01 年。
- 江小角 Jiang Xiaojiao、王佳佳 Wang Jiajia：〈劉大櫚對清代徽州教育的貢獻及影響〉“Liu Dakui dui qingdai huizhou jiaoyu de gongxian ji yingxiang”，《安徽史學》*Anhui shixue* 2014 年第 3 期。

- 江小角 Jiang Xiaojiao、朱楊 Zhu Yang：〈姚鼐主講安徽書院述略〉“Yao Nai zhujiang anhui shuyuan shulüe”，《合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Hefei xueyuan xuebao (shehui kexue ban)*第29卷第6期，2012年11月。
- 吳承學 Wu Chengxue：〈明代八股文〉“Mingdai baguwen”，收入吳承學 Wu Chengxue：《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Zhongguo gudai wenti xingtai yanjiu*，廣州 Guangzhou：中山大學出版社 Zhongshan daxue chubanshe，2000年。
- ：〈評點形態源流〉“Pingdian xingtai yuanliu”，收入吳承學 Wu Chengxue：《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Zhongguo gudai wenti xingtai yanjiu*，廣州 Guangzhou：中山大學出版社 Zhongshan daxue chubanshe，2000年。
- ：〈現存評點第一書：論《古文關鍵》的編選、評點及其影響〉“Xiancun pingdian diyishu: lun Guwen guanjian de bianxuan, pingdian ji qi yingxiang”，收入章培恆 Zhang Peiheng、王靖宇 Wang Jingyu 主編：《中國文學評點研究論集》*Zhongguo wenxue pingdian yanjiu lun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2年。
- 汪世清 Wang Shiqing：〈不疏園與皖派漢學〉“Bushuyuan yu wanpai hanxue”，《江淮論壇》*Jianghuai luntan* 總第162期，1997年10月。
- 林潤宣 Lin Runxuan：〈論戴震注《騷》的原則與特點〉“Lun Dai Zhen zhu Sao de yuanze yu tedian”，《遼寧大學學報》*Liaoning daxue xuebao* 1999年第5期。
- 侯美珍 Hou Meizhen：〈明清八股取士與經書評點的興起〉“Mingqing bagu qushi yu jingshu pingdian de xingqi”，《經學研究集刊》*Jingxue yanjiu jikan* 第7期，2009年4月。
- 孫彥 Sun Yan：〈以古文之法入於時文——論唐順之的八股文創作〉“Yi guwen zhi fa ru yu shiwen: lun Tang Shunzhi de baguwen chuanguo”，《船山學刊》*Chuanshan xuekan* 2013年第4期。
- 徐道彬 Xu Daobin：〈戴震《屈原賦注》的文學成就〉“Dai Zhen Qu Yuan fu zhu de wenxue chengjiu”，《徽學》*Huixue* 第3卷，2004年12月。
- ：〈戴震《屈原賦注》的小學成就論述〉“Dai Zhen Qu Yuan fu zhu de xiaoxue chengjiu lunshu”，《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Hun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第20卷第2期，2006年3月。
- ：〈徽州樸學成因的地域性解讀——以戴震為中心的考察〉“Huizhou puxue chengyin de diyuxing jiedu: yi Dai Zhen wei zhongxin de kaocha”，

《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Anhu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第32卷第3期,2008年5月。

高壽仙 Gao Shouxian :〈明清制義風格的嬗變〉“Mingqing zhiyi fengge de shanbian”,收入朱誠如 Zhu Chengru 等主編:《明清論叢》*Mingqing luncong*第2輯,北京 Beijing:紫禁城出版社 Zijincheng chubanshe,2001年。

張素卿 Zhang Suqing :〈「評點」的解釋類型——從儒者標抹讀經到經書評點的側面考察〉“Pingdian’ de jieshi leixing: cong ruzhe biao mou dujing dao jingshu pingdian de cemian kaocha”,收入鄭吉雄 Zheng Jixiong、張寶三 Zhang Baosan 合編:《東亞傳世漢籍文獻譯解方法初探》*Dongya chuanshi hanji wenxian yijie fangfa chutan*,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2005年。

陳水雲 Chen Shuiyun :〈清初宜興派的八股文批評:以豐義儲氏為討論中心〉“Qingchu yixingpai de baguwen piping: yi fengyi Chushi wei taolun zhongxin”,《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Zhongguo wenhua yanjiusuo xuebao*第59期,2014年7月。

陳志信 Chen Zhixin :〈論戴震「觸事廣類」的研《詩》方法〉“Lun Dai Zhen ‘chushi guanglei’ de yan Shi fangfa”,《中國經學》*Zhongguo jingxue*第16輯,2015年8月。

——:〈從理學修為面向論朱熹的《楚辭集注》〉“Cong lixue xiuwei mianxiang lun Zhu Xi de Chuci jizhu”,《政大中文學報》*Zhengda zhongwen xuebao*第24期,2015年12月。

馮峰 Feng Feng :〈桐城派與徽州樸學〉“Tongchengpai yu huizhou puxue”,《安徽史學》*Anhui shixue*2012年第5期。

黃建榮 Huang Jianrong :〈戴震《屈原賦注》的字詞注釋特色〉“Dai Zhen Qu Yuan fu zhu de zici zhushi tese”,《東華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Donghua ligong xueyuan xuebao (shehui kexue ban)*第23卷第1期,2004年3月。

黃強 Huang Qiang :〈明清「以時文為古文」的理論指向〉“Mingqing ‘yi shiwen wei guwen’ de lilun zhixiang”,《晉陽學刊》*Jinyang xuekan*2005年第4期。

蒲彥光 Pu Yanguang :〈談八股文如何詮釋經典〉“Tan baguwen ruhe quanshi jingdian”,《臺北大學中文學報》*Taipei daxue zhongwen xuebao*第6期,2009年3月。

趙靜 Zhao Jing :〈汪瑗的生平及著述〉“Wang Yuan de shengping ji zhushu” ,
《圖書館學研究》 *Tushuguanxue yanjiu* 2016 年第 9 期。

劉祥光 Liu Xiangguang :〈時文稿：科舉時代的考生必讀〉“Shiwengao: keju
shidai de kaosheng bidu”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Jindai zhongguoshi
yanjiu tongxun* 第 22 期，1996 年 9 月。

—— :〈宋代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Songdai de shiwen kanben yu kaoshi
wenhua” ,《臺大文史哲學報》 *Taida wenshizhe xuebao* 第 75 期，2011
年 11 月。

蔣立甫 Jiang Lifu :〈關於《屈原賦注》的三個問題〉“Guanyu Qu Yuan fu zhu
de sange wenti” ,《古籍整理研究學刊》 *Guji zhengli yanjiu xuekan* 總第
47 期，1994 年 1 月。